

第二章 一個中國時期的國家認同

Erik H. Erikson 認為，一個真正的認同必須在現實的三個層面上獲得肯定：一、事實性：這個認同必須涉及一組可以認定的事實；二、經驗性：必須涉及一組歷史經驗，人們可透過這一經驗，產生具體的認同；三、現實性：這一認同，有將人們結合在一起行動的可能。¹國內學者吳馭人也認為，新的台灣國家，建立在「台灣」這個不同群體共享的共同空間的現實基礎上，正是「中國認同」所極欠缺的，因此，在台灣民主化後「台灣國家認同」，這個國家象徵在未來獲得穩定的確認（daily plebiscite），應是水到渠成之事。²

因此，就理論層面而言，兩岸的分隔，使得在台灣住民因每日實際在所接觸到的台灣，並從中建構「台灣認同」，要比無法在每日實際接觸的大陸，卻要建構「中國認同」容易許多，但在兩蔣時代卻動用大量資源，抵擋這種「台灣認同」趨勢，在台建構「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直到蔣經國晚期才逐漸遭受挑戰。

總的來說，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因與中國共產黨的戰事失利，退守台灣，兩岸關係展開新的一頁，而蔣介石、蔣經國的兩蔣時代（其間包含短暫的嚴家淦時代），秉持漢賊不兩立的原則，及用盡政治力量在台灣極力將被日本殖民達五十年的台灣人民，在制度認同、文化認同及族群認同領域中，努力再社會化（re-socialize），以塑造中國人及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但隨著時空環境的不同，此時期的國家認同也被迫做出修改，並為更激烈的國家認同變遷奠下基礎；在不同的國家認同中兩岸關係也呈現不同的面貌。

¹ Erik H. Erikson, *Dimensions of a New Ident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4), p. 33, 轉注自：吳馭人，「民主化的弔詭與兩難？」，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1998年7月），頁48。

² 吳馭人，「民主化的弔詭與兩難？」，頁48。

第一節 兩蔣與一個中國政策

兩蔣時代的國家認同以「一個中國」為施政主軸，海峽兩岸都認定己方具有完整國際法人地位，並相互否定對方的國際法人地位，有學者以「內戰理論」及「同一性理論」加以闡述：³

一、內戰理論：

內戰理論緣由交戰團體（Belligerency）或叛亂團體（Insurgency）間有關的國際法規範，指一個國家因內戰而存在的兩個政府，但雙方均主張本身為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兩蔣時代主張中華民國是唯一合法政府，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叛亂團體。

二、同一性理論：

指分裂國家的一方與原被分裂國為「同一」（identity）具完整的國際法人格地位。用在兩岸問題上，就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堅持的一國，與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為「同一」，具有完整的國際法人地位。聯合國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就是以此原則處理中華民國會籍問題，這個理論又可分為兩種：

1.完全同一理論

指分裂國家其中一方，主張其主權及憲法效力所及的地區均涵蓋對方，如中華民國宣稱涵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涵蓋臺、澎、金、馬等。

2.國家核心裡論（縮小理論）

指分裂國家的某一方主張，雖然其目前所管轄的區域縮小，但縮小的部分與原有國家是「同一」的，縮小的地區為原有國家的核心地區，其國際人格並未改變，主權仍涵蓋未分裂前的地區，但有效管轄權僅有目前地區，承認分裂的另一方有效治權，但不承認對方享有在本身領域內的主權。

³ 張亞中，兩岸主權論（台北：生智，1998），頁 57～61。

依國家分裂後的國際法規範，兩蔣政府，至少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蔣經國宣布自同月十五日零時起解嚴之前，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除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全力鎮壓台獨聲浪之外，尚且是由內戰理論的思維，認為中共是叛亂團體，必須加以消滅，逐漸經由「同一性理論」中的「完全同一性理論」思維過渡到「國家核心理論」思維。

換言之，中華民國政府，在兩蔣時代由將中國大陸政權視為叛亂團體，並誓言將其除之而後快的理想，在受到國際社會及國內政情的轉變與壓力後，逐漸轉為承認中共在中國大陸的統治現實，但並不放棄中華民國對大陸主權的務實方向轉變，期間兩岸關係也隨著變化。儘管兩岸在近代的一九四九年再度走入了分離並對立的狀態，但是兩岸政府的所有聲明中，都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兩邊都堅持本身所代表的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也相互不讓對方獨立出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一個中國」意涵的詮釋，主要立論基礎是：⁴一、中國雖經歷朝代變革，由夏商周而中華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變更皆是在中國實體繼存下所產生。二、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繼「已滅亡的」中華民國而存在。三、台灣自古是中國的一部份，且二戰後依開羅宣言等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擁有台灣的主權，等等。

但以中華民國的立場看待台灣，卻有經歷撥亂反正而後成為復興基地的艱辛過程；在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之後，台灣雖在形式上回歸中華民國統治，但代表國民黨政府來台主持政務的陳儀，卻在中國大陸日漸混亂的局勢中，力圖將台灣自外於中國大陸的混亂，甚至以台灣情況特殊，拒絕讓一九四七年於南京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在台實行，⁵雖然陳儀的各項不適當作為，導致了在台灣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二二八

⁴ 國史館編印，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台北：國史館，2000），頁10。

⁵ Christopher Hughes,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25~26.

事件」，但在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台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之後，在制度、社會、文化、價值觀等各項觀點與中國大陸的差異，兩蔣在中國大陸淪陷後，在台灣所面臨的正是這種混亂的局面。至於台灣的地位，不論是陳儀有意將台灣特殊化，或台民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國民黨政府仍然視台灣為「中華民國的一部份」，而「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在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自不待言。

事實上，在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其統治台灣的正當性是建立在法統上，而法統是要求推翻在大陸上的中共政權，⁶因此，堅持一個中國與反共復國成爲國民黨合法性（legitimacy）的最重要來源，若細分蔣中正與蔣經國時期，對「一個中國」內涵的轉變，又可細述如下：⁷

一、蔣中正時期

蔣中正主政時期，國民政府堅守「一個中國政策」的具體表現，是「漢賊不兩立」的立場，特別是反映在聯合國代表權的爭論與對外關係上，中華民國均強調是中國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如：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指責蘇聯提案取消中華民國代表權，乃違反聯合國憲章；同年三月二日，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強烈表達光復大陸決心；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蔣廷黻在聯合國駁斥北平政權不能代表中國，中華民國才是依據國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所組成，才具有合法性；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二日，嚴家淦在聯大演說強調中共是偽政權，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外交部長魏道明在第二十五屆聯合國常會中發表演講，仍認爲中共在竊據大陸二十年後依舊是「叛亂團體」等等。

二、蔣經國時期

蔣經國主政後，在「一個中國」政策上，仍延續蔣中正時期的政策。

⁶ 石之瑜，當代台灣的中國意識（台北：正中，1993），頁232。

⁷ 柳金財，「論五〇年以來中華民國政府關於『一個中國論述』內涵的持續與變遷」，台灣主權論述論文編輯小組編，台灣主權論述論文集（上）（台北：國史館，2001），頁299~309。

他提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強調依據蔣介石在一九五八年所公開宣稱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政策，作為光復大陸的方法，反對「國共第三次合作」、「三通四流」，認為「談判是戰爭的另一種形式」，認為談判是中共在武力無法達成目的時，一種分化敵人的手段，更在文化政策上以正統自居，以有別於中共所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宣稱「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在台北的中央政府是中華民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將中共政權定性為「中華民國的叛亂團體」；甚至到一九七七年，外交部發言人金樹基，仍對外宣稱，中華民國處境與東、西德，及南、北韓等分裂國家不同，因為這些國家是因外力造成分裂，兩岸卻因中共叛亂造成分裂，顯然時至一九七七年，蔣經國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仍然不願放棄造成東、西德零和遊戲的「賀爾斯坦」原則，而實行「漢賊不兩立」政策。

雖然有論者認為，蔣介石在一九五八年所提倡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策略，是在接受無力以武力推翻中共政權的現實，故務實的自一九六〇年代起，就放棄以武力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手段，也因此，認為蔣介石在此情況下已然接受兩個中國的現實，⁸也有論者陳述，一九五四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rster Dulles），在與蔣介石討論反攻大陸事宜時，蔣介石強調反攻不用美國參戰，僅需美國以武器、經濟、技術支援就已足夠，但就當時台灣連防衛共軍全力攻擊的能力都不足等環境，杜勒斯推論蔣介石已無反攻大陸的意圖等等。⁹

但就兩蔣在台所行的各項政策而言，卻又證明兩蔣時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從不動搖，雖然這個政策在台灣內部逐漸受到挑戰，其中，

⁸ J. F. Copper, *Taiwan: Nation-State or Province?* (Colorado : Westview Press, Inc., 1990), p. 30.

⁹ Steve Tsang, "Chiang Kai-Shek and the Koumintang's Policy to Reconquer the Chinese Mainland, 1949-1958", in Steve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3), p. 53.

從一九七一年聯合國的席次保衛戰中，中華民國政府遭受挫敗，一九七八年台美斷交，台灣在民主化及國際關係中受挫的環境交錯中，台灣雖在嚴格言論限制下，台灣內部仍開始出現討論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等微弱的聲音，但兩蔣主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仍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一九七二年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曾在立法院內報告說：中華民國反攻復國的總目標絕不改變，而中華民國對於共匪叛亂集團不妥協的堅定立場絕不改變，在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後，更重申中華民國的目標是結合大陸反共人民，推翻中共政權，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¹⁰

這種放棄中國大陸偏安台灣的現實與反攻大陸收復河山論調的同時出現，持平而論，或許只能以兩蔣對於「反攻大陸」、「收復河山」的企圖是「有心無力」加以詮釋，但只要有「心」，則在「一個中國」認同領域上，兩蔣的決心就不容懷疑了。

對於早期台灣對一個中國立場的堅持，可由《自由中國》負責人雷震案的發生獲得證明；曾經擔任《自由中國》雜誌編輯委員的傅正認為，《自由中國》主張一個中國的立場前後是相當一貫的，甚至當時台籍政治菁英楊金虎亦撰文表示「我愛台灣，我更愛中國」，郭雨新也認為「在責任上，每一台胞為國民一份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反攻復國的責任無可逃避」。¹¹凸顯《自由中國》雜誌早期的「一個中國」立場。

而《自由中國》雜誌所以能以開放的態度批判國民黨政權並維持十一年之久，顯然與該雜誌反共救國立場與私人黨政關係有密切關係，¹²《自由中國》雜誌最後被禁，並株連雷震等多人，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宣傳反攻無望論」，更見，蔣中正時代，對於消滅中國共產黨，取代中國共產黨繼續統治中國的理念，絕對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進行挑戰的。

¹⁰ 邵宗海，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台北：華泰，1997），頁 206。

¹¹ 陳儀深，「中國自由主義在台灣延續與沒落」，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1998），頁 196。

¹² 陳儀深，「中國自由主義在台灣延續與沒落」，頁 195。

至於在蔣經國時代，所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可視為對島內違反「一個中國」政策政治運動的箝制，甚至在之後的一九八一年發生陳文成命案，及一九八四年發生劉宜良（江南）命案，都代表著台灣內部保守派勢力，在肅清美麗島政治異議團體後，更進一步以特務力量封殺海外異議勢力的實際行動，¹³甚至一九八六年菲律賓馬可仕被迫外逃事件，台灣「黨外」勢力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成立「民主進步黨」，國民黨面臨空前壓力時，蔣經國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 Katharine Graham 的專訪，仍對於民進黨的成立表示，「民進黨」必須支持中華民國憲法、反共黨、反台獨，¹⁴都極能凸顯對於蔣經國時代極盡所能的確保一個中國政策的決心。

在蔣氏父子執政時代，不論面對大陸所採用的是「內戰理論」或「同一性理論」，作為對大陸政策制訂之基礎，可以確定的是，兩蔣時代絕無放棄「一個中國」政策之絲毫意圖。

而蔣氏父子，在對台統治期間，常被人定位為獨裁、專制、開明專制或其他相類似的話語，總的來說，一般認為蔣氏父子在台統治期間，所呈現的現象，是決不容許任何人挑戰其權威的，若姑且不論蔣氏父子所呈現的是極端獨裁或開明專制統治方式，蔣氏父子不被一般論者接受為民主領袖卻也是個事實。

而獨裁意識型態更是充滿對國家及武力的崇拜，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節，極權獨裁意識型態鼓吹任何一個階級、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都必須在關鍵時刻犧牲自己利益，維護國家利益。¹⁵

若依據這些獨裁政權的標準，檢視蔣氏父子崇尚以武力反攻大陸，以民族主義精神的提倡，並要求全台灣民眾為此目標犧牲奉獻以對抗中共，幾乎完全相同。

¹³ 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9）（台北：麥田，1999），頁 184。

¹⁴ Alan M. Wachman, *Taiwan -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New York: An East Gate Book, 1994), p. 144.

¹⁵ 孫哲，獨裁政治學（台北：揚智文化，1995），頁 114。

而在蔣氏父子「一個中國」政策的堅持下，其對於統一台灣民眾國家認同作法，以統合台灣所有階層力量以對抗中共，在實際作為上，必然對於以中華民國五權憲法的維護的「制度認同」，及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與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等盡全力推動，更何況對於五權憲法維護的制度認同、對於中華民族維護的族群認同，及對於中華文化維護的文化認同，三個環節所形成的台灣住民國家認同程度，與蔣氏父子政權的維繫息息相關，蔣氏父子依憑獨裁或近似獨裁權力，對於此三種認同的推動，及對不同於此三種認同的異議的鎮壓，是極其容易理解的事，其詳情，有待下一節分析。

第二節 兩蔣時期在台灣的國家認同

兩蔣的「一個中國」思維是不容懷疑的，那麼兩蔣在台灣又是如何推動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的內涵，就像學界所同意的，其面向很廣，其中不僅是國家領域的確定，更牽涉到政治與社會歷史的建構，也包含對民眾表達需求、強化某些行為並排除某些行為、發展經濟、文化傳承等等。¹⁶所以，國家認同已儼然成為當政者為追求某些政治目的的工具。¹⁷在兩蔣時代，推動特定的國家認同，也與中華民國的存亡及蔣氏政權的存亡相互緊密結合在一起。

國內學者認為，民意的動向和政權的維繫是十足相關的，既使在威權體制下，統治者對人民的一言一行亦甚留意，只不過是關切的動機和收集民意的的方法不同罷了。¹⁸有國外學者以另一種說法認為，國家的認同常反應國家中一些特定部門（specific sector）或特定利益團體（specific

¹⁶ Raymond Grew,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Peter Boerner, ed., *Concepts of Nationalism-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Germany: Auflage, 1986), p. 39.

¹⁷ Raymond Grew,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p. 32.

¹⁸ 游盈隆，「族群認同的政治心理分析」，徐火炎等，台灣族群政治專題（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台北：月旦，1996），頁 281。

interest group) 的主張，當這些特定部門或特定利益團體有充足的影響力時，其主張就會影響及全民，並被全民接受。¹⁹

所以，雖然在兩蔣的威權時代，不易找出民意調查的相關資料，做為支持國家認同轉變與否的證據，但因為威權統治對於民意的在意亦如民主社會，外加兩蔣對台灣權傾一時的時空背景，使得兩蔣的國家認同政策，亦相當程度的反映當時主流民意的現象，而觀察與分析兩蔣的重要言行，幾乎等同於瞭解台灣民眾對於國家認同的走向。

國外學者認為，人民對國家的認同起於從小的教育，而堅固於對國家過去的光榮與對人民的照顧之上，²⁰也有學者認為，國家認同不僅是全民依據歷史的發展所發展出的感情，其中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單純國家存在的反應，更是對於國家的光榮記憶與期望的表現。²¹

因兩蔣時代基本上，對台灣人民的經濟建設確有幫助，在教化上也極盡能力的給予中華民國、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光榮過往的教化，使台灣民眾在國家認同上必然受兩蔣政府的影響，且因兩蔣對於一個中國理念的堅持，對於台灣民眾的教化必然以此為方向，並強調台灣民眾必須在國家認同上認同中華民國，何況，依據國外學者對於東歐各國，在列寧式政黨統治及統治所遺留下的現況研究發現，人民對於列寧式政黨統治下，對於政治會抱持危險並敬而遠之的態度，而且在人民無力進行政治認同分享的狀況下，統治者與統治規章幾乎等同於認同。²²

進一步言，統治者的言行，尤其是統治者的言論，幾乎等同於人民政治認同的準則，台灣人民在面對兩蔣列寧式的、專制的國家認同教化，因對政治領域的恐懼，也不被准許於參與政治異議活動，自然就無力對

¹⁹ Peter Boerner, "Introduction", *Concepts of Nationalism-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p. 14.

²⁰ Ross Poole, *Nation and Identity*(New York : Routledge, 1999), pp. 104~105.

²¹ Boerner, "Introduction", p. 14.

²² Ken Jowitt, "The Leninist Legacy",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10~211.

兩蔣等執政菁英提出反對意見，所以面對兩蔣的強力國家認同教化，尤其是兩蔣對於國家認同教化的言論，除了接受外，實在無反抗的力量，更何況實際情況是，民眾會自認同的過程中，獲取相當的利益，²³使得民眾依據兩蔣的「教化」進行國家認同的轉變現象更加顯著。

依據本論文對國家認同的詮釋，國家認同分由族群認同、制度認同及文化認同三個層次加以檢視，這使得兩蔣對於這三個層次的談話，自然就成為檢視台灣國家認同走向的重要依據，尤其在兩蔣的威權時代裡，元首的談話不僅絕不容許任何人提出異議，專制的施政作為，也使龐大的政府機構，隨著「領袖的指示」做出施政以為反應，而大量的宣傳作為，也是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觀念無法逾越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政策性談話規範，若將兩蔣的重要談話及政府機關相對應的作為，以文化認同、制度人同及族群認同三個層次加以分析，可有如下的呈現：

一、文化認同面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面對的是受過五十年日本殖民的台灣民眾，猶如將風雨飄搖中的政府遷入日本人居住的台灣地區，可以想見當時的混亂，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所面臨的正是將長期受日本統治與教育的台灣民眾，「再社會化」為中國人的挑戰，國民黨政府得去除被其視為落後文化或日本帝國文化的台灣現行文化，學者 Raymond Grew 認為，國民政府在將台灣人民「中國化」的過程中挾其政治、經濟優勢透過教育、媒體、語言及政府意識型態等手段，將中國文化霸權強加諸於台灣人民身上。²⁴

²³ Raymond Grew,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Peter Boerner, ed., *Concepts of Nationalism-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p. 36.

²⁴ Thomas B. Gold, "Civil Society and Taiwan's Quest for Identity", in Stevan Harrell & Huang Chun-Chieh,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4), p. 60.

其實，蔣中正早在民國四十一年推動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促使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的全面改造，四十二年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時，就指出文化建設與文藝政策的方向，²⁵政府遷台後，當然也將此中華文化建設方針帶來台灣，並在台推動中華文化的薪傳工作，到民國五十五（一九六六）年，大陸發動狂熱的文化大革命，嚴厲地批判傳統文化，使得傳統中國文化遭受空前的摧殘，國民政府遂決定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資對抗，復興中華文化因此成為更為鮮明的政策方向及政治宣示。當時定國父誕辰紀念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次年（一九六七）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由蔣中正擔任會長，在全省設立分支機構，全力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²⁶一方面保存中華文化在台之存續，一方面藉以在台教化民眾認同中華文化，作為對中共鬥爭之動力。

依據學者齊光裕轉述繆玉青的說法，認為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的重要成效是：²⁷

- （一）、興建圖書館、音樂廳、文化中心（此項應屬於後文建會時期）等一百多處。
- （二）、中國的古籍整理與保存。出版中華文化叢書一〇七種，編印古籍今譯三十三種，出版「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中譯本十五冊，出版「中華科學技藝史叢書」共十六種，出版「中華文化復興叢書」十八集。
- （三）、文藝的研究與各種講座的舉辦。
- （四）、民俗藝術的推廣，特別是對國劇的提倡最具成效。
- （五）、孝行的獎勵與好人好事之推舉。
- （六）、書法繪畫藝術之提倡。

²⁵ 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台北：揚智，1996），頁 177。

²⁶ 請參閱：「臺灣的故事-文化篇：在中與西、傳統與現代之間」，張貼於 <http://www.gio.gov.tw/info/taiwan-story/culture/down/3-3.htm> 網站。

²⁷ 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頁 177~178。

而依據當時主政者的構想，認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以倫理、民主、科學為實踐綱領，依據蔣中正對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相關指示推動，其基本精神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點：²⁸

（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就是三民主義思想向大陸更積極、更全面的進軍。

（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實際上就是三民主義實踐運動，即要在人本精神的基礎上致力於倫理、民主和科學的現代化國家建設。

（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就是要憑藉我們民族傳統之人本精神和倫理觀念，來喚醒這一代人的理性良知，以建立反共鬥爭堅強的心理基礎和精神動力，成為徹底消滅共產邪惡思想，摧毀匪偽政權的利器；更為抑制世界斥禍，挽救世界文化危機的途徑。

顯然自台灣回歸中華民國起的約二十年間，文化工作基本上是以發展中華文化對抗共產政權為主軸的。²⁹不論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或是中華文化認同運動，在兩蔣的時代裡，都富含有與中共鬥爭的政治意義。

這些作為，正是國民政府意圖在文化認同上，將台灣民眾由對日本的認同轉變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以便在國家認同上將台灣民眾帶往傳統中國國家認同的一端。

若以教育體系看待文化認同的轉變狀況，國內學者洪振華認為，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協助同化，那麼，對於兩蔣時期，有關文化認同的轉變作為，或可經由對當時師範教育對教師培訓內容的分析與檢視，以瞭解當時對於文化認同的作為情形；一九五四年起，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方面，各師範院校遵奉教育部令，每週於國文教學時間內，勻出部分時間教授「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而且分年教授《論語》、《孟子》、《大

²⁸ 台灣省新聞處編印，教育發展與文化建設（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90），頁 413~414。

²⁹ 請參閱：「臺灣的故事-文化篇：推動現代化與中華文化」張貼於 <http://www.gio.gov.tw/info/taiwan-story/culture/down/3-2.htm> 網站。

學》和《中庸》等四書。「四書」被認為是儒家思想的精粹，也是中國固有文化的根源。直至師專改制師院多年之後的一九九二年，當各師院研商出「師範學院各學系必修科目表草案」後，教育部仍建請研究將四書列入的問題，於是四書被列入必修語文科目。³⁰正凸顯，在更威權的兩蔣政府時期（蔣經國於一九八八年去世），對傳統中國文化教育的強調。

依據洪振華的研究，在台灣自日本佔領轉為回歸國民政府後的兩蔣時期，對於文化認同作為及攸關文化認同的師範教育政策，可分成幾期加以描述：³¹

（一）、清除日本文化期（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五年除夕，當時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曾向台灣人民廣播：「心理建設，在發揚民族精神。…。關於文化設施，所謂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當可以符合」。此期的教育政策，旨在藉由民族文化和中國大陸語言的推行，清除日本文化。

在師範教育方面，一九四六年在台北設立培育中學師資的省立師範學院。另將原有總督府師範學校改為台北、台中、台南、新竹、屏東五所師範學校，以培育小學師資。

又為了推行民族文化及語言教學，除辦理各種講習外，並積極從中國內地招募師資來台，協助在台推動教育。

（二）、反共抗俄期（一九五〇年～一九六〇年）：

一九四九年冬中國大陸淪陷，國民政府遷台，一切施政以反共抗俄、復國建國為最高國策。

本階段師範教育的特色在於加強與軍訓單位、國民黨、中國反共救

³⁰ 請參閱：洪振華，「廿世紀台灣師範教育與國家認同塑造」該篇論文於 2002.10.29 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九樓，「第四屆教育哲史討論會」提出，張貼於 <http://www.ed.ntnu.edu.tw/~seph/1029-2.htm> 網站。

³¹ 請參閱：洪振華，「廿世紀台灣師範教育與國家認同塑造」張貼於 <http://www.ed.ntnu.edu.tw/~seph/1029-2.htm> 網站。

國團等組織活動相結合。

(三)、光復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期（一九六一年～一九八七年）：

一九六一年成立孔孟學會，將儒家思想作為復興中華文化的重點。一九六六年，更鑑於中共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文化的摧殘，乃全面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此期的重點是以三民主義作為文化認同推動的主軸，結合並指揮中華文化做為推動的工具或內涵，將中共視為破壞中華文化的民族罪人。所以，一九八一年中國國民黨更提出「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方案，作為當時統一政策的基調。顯見國民政府來台後，在台推動文化建設與文化認同的積極。

而兩蔣關於中華文化認同談話，在威權時代的當時，更是大部分都轉化成政府的政策，或在政府政策提出後，達到強化的結果，舉其重要談話內容作為證明，以下為蔣中正部分：³²

對於中共的攻擊：「----、毀滅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的俄帝及其傀儡朱毛奸匪，乃是我們中華民族唯一的仇敵！」（1954）、「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乃是針對毛匪『文化大革命』進行思想戰與文化戰的重要武器！」（1968）、「五千年的民族文化傳統，就是埋葬毛賊獨夫的無形戰力」（1970）、「最終消滅共匪毛賊者，乃必為我中華文化所表現的『民族獨立的性格與能力』之大義正氣！」（1970）。

對於台灣民眾的教化：「各種普通以上的考試（及技術人員亦不例外），均應接受本國史地的考試，----使能激發一般國民的愛國心和責任感」（1952）、「我們中華民國的教育宗旨，----以發揚民族文化與民主精神為目的」（1968）、「如何使臺灣成為民族文化傳統的中心，乃是我們建設臺灣的主要課題」（1958）、「----宣揚孔孟學說的精神，領導國民復國建國的思想，以實現三民主義，來復興中華民族」（1961）、「國父三民主義的思

³² 請參閱 <http://chungcheng.org.tw/thought/class06/0027/0004.htm> 網站。

想，即是以孔孟學說為其本源；----對於孔孟學說的宏揚與實踐，實屬無比的重要」(1962)、「----文化復興運動，不是屬於一時一地的運動，而實為復興民族、重建中華，一種長期的運動」(1967)、「完成民族主義的倫理建設----實為我們增強精神備戰，致力反攻復國的中心課題」(1964)、「深盼全國教育工作者，----發揚孔子的教育思想，達到三民主義教育建設的目標」(1970)。等等。

這些言論都表現出蔣中正在對抗中國大陸政權時，推動台灣文化認同的決心與行爲；由其內容也發現，在一九六六年中共發動「文革」之前，蔣中正對於在台灣文化認同的推動就已不遺餘力，顯見蔣中正對於在台推動中華文化認同之一貫性，並非全因對抗中共文化大革命而起，反而是蔣中正對於在台推動文化認同的使命感所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僅是催化蔣中正政府在台傳播中國文化的方式變得更加積極而已。關於蔣經國部分：

對於台灣文化建設：「革命青年，就該以現在為你們的國家歷史、民族文化，來做一連串戰鬥新事業的起點」(1978)³³、「在台澎金馬的中國人，卻是始終在實踐三民主義、復興民族文化、維護民主憲政、享受自由生活的中國人」(1979)³⁴、「確定國家建設的終極目標，在於綿延和發揚中華民族文化」(1979)³⁵、「傳承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的我們民族文化，加以發揚光大，實是我們教育的基本目標。----教育還需負起綿延民族文化的使命」(1980)³⁶、「當前國家建設，大量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而各種人才必須對當前時代有中心信仰，那就是實踐三民主義，復興民族文化」(1981)³⁷、「教師的責任，更要引導青少年體認中華文化的精深博大、恢弘孔孟學說的義蘊、接受承繼一貫道統的三民主義文化，來實現至善

³³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七年言論集，頁 27。

³⁴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八年言論集，頁 34。

³⁵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八年言論集，頁 99。

³⁶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九年言論集，頁 44。

³⁷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年言論集，頁 40。

至美的教育目標」(1983)³⁸、「希望大家一起來，重振中國人勤勞節儉的傳統美德，回復我們樸實清明的社會面貌」(1985)³⁹、「期勉全國教師負起傳承與發揚中華文化的責任」(1986)⁴⁰。

對於中共的攻擊：「我們堅決反共，更是爲了保衛國家的獨立自由和悠久的歷史文化，不讓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被全無中國理性的共匪去摧殘滅絕」(1979)⁴¹、「三十多年來復興基地各方面的進步，不僅提供此地成爲中華歷史文化的傳人和中國現代化繁榮的櫥窗，也爲未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後的復興建設工作提供了藍圖」(1982)⁴²、「真正的中華文化在哪裡？就在每一個有熱血良知的中國人心中，在每一個中國人認同回歸的三民主義的復國大業上面」(1979)⁴³、「多年以來，我們國家建設的方向：---文教發展上，積極發揚民族精神，光大中華文化，保存固有優良傳統」(1984)等等。⁴⁴

兩蔣致力於推動文化認同，雖然在早期是將已被日本統治達五十年的台灣民眾，重新社會化後變回中國人，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中共在大陸推動文化大革命起，兩蔣政府於一九六七年起所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又另外肩負起對抗中共文化政策，並肩負傳承中華文化的責任。

國外論者 Edwin A. Winckler 就認爲，在蔣中正初期，對於文化的認同採取以孫中山主義爲基礎，外加科學與民主的方式進行，具有自由主義的風範，在蔣中正後期轉爲強力推動現代化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到了蔣經國時期，才撤除延續二十年的阻止「文化西方化」政策；雖然兩蔣主政時期對於文化建設的支出比國家平均支出爲低，兩蔣也都否認主導文化發展的方向，只承認提供文化發展的服務，但在國民黨「黨國

³⁸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二年言論集，頁 72。

³⁹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四年言論集，頁 63。

⁴⁰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五年言論集，頁 145。

⁴¹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八年言論集，頁 2。

⁴²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一年言論集，頁 106。

⁴³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七年言論集，頁 68。

⁴⁴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三年言論集，頁 10。

(party-state)組織」架構中，蔣氏父子對文化發展方向的影響力卻是十分巨大的。⁴⁵

以五〇年代國民黨政府對於台灣文壇的作為，可進一步見其影響力：⁴⁶

在國民黨急欲建立一個國家文藝體制的策略影響下，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壇，呈現出濃厚的是政治上的宣傳性格，使得反共文學、戰鬥文藝成爲此一時期台灣文壇的主流，國民黨政府並依據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在武昌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確定文化政策案」的決議，在台推動對台灣藝文工作，其特徵具有如下意義：⁴⁷

(一)、黨正式藉文藝作政治宣傳：旨在對抗左翼普羅文學，及動員台灣社會各階層，宣揚反共復國的革命決心。透過文藝來傳達政治理

⁴⁵ Edwin A. Winckler, "Culture Policy on Postwar Taiwan", in Stevan Harrell & Huang Chun-Chieh,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p. 25.

⁴⁶ 李麗玲，「五〇年代國家文藝體制下台籍作家的處境及其創作初探」張貼於：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l/li-le-leng/sek-su/ch-02.htm> 網站。

⁴⁷ 依據李麗玲在前述「五〇年代國家文藝體制下台籍作家的處境及其創作初探」中的看法，認爲國民黨在台初期的文藝政策，是接續於國民黨在大陸與左翼作家鬥爭需要所制訂的，根據目前的資料顯示：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內部即曾正式提出黨文藝政策的相關議題。正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日益壯大之時，國民黨除了展開文化宣傳的部署，利用發行刊物，加以抵抗外，更在武昌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1938.3.28），通過「確定文化政策案」的決議。此案由陳果夫提出，張道藩爲起草人之一，其中與「文藝」有關的，大致有六條，其內容如下：第一：創制發揚民族精神與國家社會公共生活相應，莊敬正大，剛建和平之樂章。第二：建立三民主義的哲學、文學、及社會科學之理論體系。第三：實施總理紀念獎金辦法，以策勵文藝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教育及社會服務之進步。第四：明定獎勵出版辦法，保障著作人權益，以提高出版道德，文化水準，並取締違反國家民族利益或妨害民族意識之言論文字。第五：設立國家學會，選拔文學、藝術、科學等積學之專家，以獎進學術研究之深造。第六：推廣新聞、廣播、電影、戲劇等事業，以發揚民族意識爲主旨。這六條綱領顯示出：國民黨的文藝理念，毫無疑問地，乃建構於「三民主義政治理論」的體系下，並以積極主動的獎助方針「輔導」文藝。是以，〈確定文化政策案〉應爲國民黨在正式文件中提出有關文藝政策的第一次。

念，招攬群眾，作為救亡圖存的武器，是國民黨從大陸到台灣始終不曾改變的文藝基本方針。

（二）、建立黨推動文藝工作的基本模式：其中〈確立文化政策案〉所提辦法，如：設立國家學會、擬定獎金辦法等，自該案確立之後，成為以獎助文人鉅額獎金以創作反共文學，及成立文藝組織以掌握文藝青年、出版管道等的重要策略。

因掌握住所有文藝創作的管道，因此也掌握住排擠不符合國民政府創立文化認同的籌碼，使得國民政府在治理台灣的初期，得以順利的推動其文化認同工作。

學者李麗玲認為，國民政府在遷台後特別強調「修補反共體系，嚴密控制社會思想和人民的精神生活」，在國民黨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的重整工作中，更視文藝為鞏固政權的武器，因此特別設立宣傳部第四組（即今文工會）專司「文化工作」；一九五二年，國民黨中央改造時通過「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綱領」，其中有關文藝的幾項提案中，包含「文化改造運動」一項，宗旨為「倡導文藝改革：改革並充實文學、美術、戲劇、電影等之內容與形式，提高其水準，俾符合革命建國之要求。」國民黨認為：新的文藝政策要落地生根，舊的文學成果則需剔除殆盡。國民黨對於台灣文化工發的主導與箝制可見一斑。⁴⁸

國民政府依此作為模式，各項針對人民的言論、出版、新聞事業等的法規、禁令，也隨之接踵而來，讓台灣文化工作進一步落入國民政府掌握之中。⁴⁹

⁴⁸ 請參閱：李麗玲，「五〇年代國家文藝體制下台籍作家的處境及其創作初探」張貼於：<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l/li-le-leng/sek-su/ch-02.htm> 網站。

⁴⁹ 依據李麗玲在「五〇年代國家文藝體制下台籍作家的處境及其創作初探」一文中的研究，發現，國民政府當時箝制文化工作的法令計有：一九四九年八月公佈「台灣省新聞雜誌資本限制辦法」。一九五〇年三月公佈「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管制辦法」，其中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並取締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書、告白、標語暨其他

台灣藝文界，在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箝制法令之外，國民政府在台大力推動國語政策，甚至以國語的流利與否作為政府官員升遷的極端標準狀態下，使得在日據時代成長的台灣本土作家，連拋棄日語學習以漢文寫作都力不從心，更遑論可利用漢文做出台灣特有文化的傳承發展工作。

國民黨更從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長官公署教育處在台灣成立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開始，國民黨在台灣施行了長達四十餘年的國語教育，此國語政策，實乃挾帶濃厚的政治目的，視語文為一切政治之基本工具，為重建台灣教育，去日本化以達成中國化，意圖迅速使「已失掉民族精神」的台灣人，「瞭解祖國的歷史，接受祖國文化的教養」，使其能完完全全成為祖國的國民；同時排除其他語言，建立北京國語的語言霸權，使中國為正統的意識型態亦隨之鞏固，加上在國民黨制式教育裏，缺乏介紹日據時代文學的體認，再加上瞭解日據時代文藝、文化體認的人士、知識份子、作家，又大多因自身之社會主義理想，而遭白色恐怖鎮壓。是以，無論在作家的嬗替、文學精神的承繼等，均產生斷層現象。⁵⁰也使得以國民政府為主軸的中國文化認同得以順利推動。

但學者 Christopher Hughes 卻認為，兩蔣對於文化發展的主導，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台灣的推行，反而成為在台灣推動國家認同政策的異化，最終，使得台灣在文化認同上轉而以鄉土文學的形式進行反撲，台灣的部分學者也認為，台灣過去所面對的日本統治，到國民黨時期以傳統文化對抗中國大陸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當局以買辦

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礙者。」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行政院因紙價高漲、用紙不敷，規定各報縮減篇幅，至多不得超過一大張。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行政院又規定：「台灣省全省報紙、雜誌已達飽和點，為節約用紙起見，今後新申請登記之報社雜誌通訊社，應從嚴限制登記」。一九五二年四月九日又公佈施行「出版法」。一九五三年修訂實施「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內政部制訂「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載事項」等等。

⁵⁰ 請參閱：李麗玲「五〇年代國家文藝體制下台籍作家的處境及其創作初探」一文，張貼於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l/li-le-leng/sek-su/ch-03.htm> 網站。

(compradores) 的姿態，接收美國帝國主義文化的不當，使得台灣文人開始提倡描繪台灣為內涵的鄉土文學；鄉土文學的提倡，讓台灣人深刻瞭解到，對於台灣自我定位及對於台灣島忠誠的重要性，雖然當時並未到達建立台灣國的強度，但不可避免的觸及了政治不滿，並連結了國家認同、政權合法性、國際地位等敏感問題。⁵¹

而台灣鄉土運動意涵著對於統治者的反抗，如早在日據時代就有楊逵、吳濁流等人的提倡，到了國民黨時代的一九七〇年代類似的鄉土運動風雲再起，在風起雲湧的鄉土文學（廣義的還包含戲劇、舞蹈、電影、歌曲等等）運動中，造成國民黨指其為「工農兵文學」而加以鎮壓，迫使提倡鄉土文學之王拓、楊清臺等多人，轉而成為政治反對運動的健將。

52

多年以後，有論者評斷當年的「鄉土文學」稱：⁵³

若以最簡扼的語言來表述鄉土文學的基本精神，則一方面是反威權、反金權、反帝、反殖；另一方面是追尋與肯定不分族群、但關懷弱勢的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這樣的基本精神，---體現在當時受到這股潮流激盪的知識界，乃至青年一代作者的視域和寫作中，並由此而直接間接地滋潤了黨外的社會運動與政治論述。

顯見鄉土文學所隱含文化認同層面的政治意義，及由鄉土文學所代表的文化認同反撲與轉變，對於台灣反對政治勢力興起及國家認同轉變力量的不容忽視。

細看國民黨接收台灣後，早期的文藝或文化工作作為，可發現，是著力於徹底將當時影響知識份子、作家、學生具有左傾思想的斷絕，另一方面又以白色恐怖的政治整肅，肅清台灣的「左派份子」，斷絕日據

⁵¹ Hughes,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pp. 34~35.

⁵² Gold, "Civil Society and Taiwan's Quest for Identity", pp. 183~192.

⁵³ 夏朝聯合會，轉載：社論：「否定鄉土文學就是篡改台灣歷史」，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版 2。張貼於 http://www.xiachao.org.tw/i_f_page.asp?repno=453 網站。

以來建立的台灣本土文學傳統。取而代之的，則是國民黨以政治為目的的文藝政策。蔣（介石）親自出面號召當時的「戰鬥文藝」，雖有推波助瀾之用意，但它的顛峰，卻敵不過內容的空泛而開始衰敗。⁵⁴而其衰敗卻又與台灣文化認同（或稱本土化）有息息相關的聯繫。

若更進一步檢視，將會發現文化的認同，將會決定一個人面對世事的觀點，⁵⁵文化認同的改變，就不得不牽涉及個人甚至整個群體一貫價值體系的轉變，對被迫改變的個人與群體，都是一個痛苦的抉擇。

在兩蔣的統治時代裡，不可否認的是，兩蔣政府的文化認同政策，在政治高壓手段的配合下，對台民推動中華文化認同運動，對支持台灣獨立者而言，絕對是一恐怖的經驗，但對於支持兩岸統一者而言，卻又是必然要有作為的選擇，雖在兩蔣時代的中華文化教化過程中，有階段性的鄉土文學或類似運動的反撲，但大體上，兩蔣時期在台灣向台灣人民推動傳統中國文化認同的政策與作為，是積極及而有具體成效的。

二、族群認同面

台灣歷來是大陸人民移入地區，由移民來源的不同，使得台灣住民約略分為外省、本省、客家及原住民四大族群，在兩岸長久的隔離，使台灣住民與大陸住民的隔閡不斷加深，而二戰後中國復佔有台灣，使得大陸住民與台灣住民間因戰亂所帶來的混居與混亂，無可避免的加劇成衝突，而這種衝突，學界常引用「內部殖民主義」加以論述。

將依賴理論運用在族裔衝突理論研究的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強調，一個國家內部也因生產關係、社會控制、文化、生活水準等等，讓偏遠地區的人民，必須忍受低教育程度、失業及缺乏營養等惡果，雖然這種說忽略了因文化或其他社會因素所造成的落後的原

⁵⁴請參閱：李麗玲，「五〇年代國家文藝體制下台籍作家的處境及其創作初探」張貼於：<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li-le-leng/sek-su/ch-02.htm> 網站。

⁵⁵ Poole, *Nation and Identity*, pp. 119.

因，⁵⁶但在台灣族群鬥爭的早期，以外省人所主導的政治優勢，常被論者作如此解釋，換言之，就是在兩蔣時代，因為外省人的政治優勢，以「內部殖民」的態勢，將台灣的閩南、客家、原住民族群邊陲化，並迫使閩南、客家及原住民等三大族群，必須依賴掌握政治大權的外省族群（菁英）才能生存，這種態勢為族群的競爭埋下易被挑動的遠因。

事實上，台灣族群意識或族裔意識的存在，早在清朝時期，台灣漢移民已逐漸發展出台灣意識，但這種「台灣意識」僅是鄉土意識，始終是從屬性的，並未與中國意識形成對抗，到後來的二二八事件，才提供了部份台灣住民反抗中國認同的動力。

對於民族主義精神教育，早在孫中山先生進行國民革命時就已存在，蔣中正在民國十六年講「三民主義要旨與三民主義之重要」時，曾提出「三民主義教育即民族教育、民權教育、與民生教育」，民國十七年九月國民政府更宣布全國教育宗旨強調「恢復民族精神」之重要，⁵⁷這種將民族精神建設與民族認同及民權建設、民生建設糾結在一起的作為，使得兩蔣在台大力推動三民主義建設的同時，也同時推動了民族教育，尤其是在與中共作嚴厲鬥爭的時代，面對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民眾再變回(re-socialize)中國人更是如此，而且兩蔣是將台灣存在的四大族群，完全不加區別的對待，總希望這四個族群在國民黨教化下，全部「變回中國人」，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政府更無法容忍台灣內部族群認同的分裂。時至一九四九年之後，國民黨黨、政、軍大批人員進入台灣，遂夾政治力量廢止日文，以強制手段扭曲台灣人的語言、思想，否定台灣地理、歷史、語言、風俗-----的特殊性，以毫不通容的手段強迫台灣人放棄原有的民族觀、文化觀，無條件的接受統治者的語言、文字、

⁵⁶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台北：正中，1993），頁 49～51。

⁵⁷ 楊國賜，「三民主義的教育思想」，楊瑩編著，轉型社會中的教育（台北：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金會，1991），頁 340～341。

思想，⁵⁸並從中建立起中華民族的認同觀念。而以這種手法著手於民族精神的推動、中國人認同觀念的建立，不僅充斥於社會，更重要的是透過教育系統對台灣住民的下一代進行徹底的改變。

自古以來，幾乎所有統治階層，都會有各種管道來培養年輕一代對於體系的認同感，傳遞給他們社會間共同價值與規範，以維持體系的安定和發展，而學校教育又被認為是達成此目的最有效的管道，⁵⁹國民黨在風雨飄搖的年代，自然對於學生教育加強對其政權有所注意的民無精神教育。

所以，一九五〇年教育部訂頒「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台灣省教育廳也頒佈「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強調民族精神教育、勞動生產教育和文武合一教育。一九五六年國民政府更以蔣中正著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作為提升民族精神教育的訴求及以民族主義的教育用於對抗蘇聯及其所扶植的中共政權。⁶⁰到民國五十七（一九六八）年更由蔣中正一席指示之後，做一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就成為國中小教學的為教育目標，因此，成為中國人，當然成為兩蔣時期在學校推動族群認同教育重要的工作。⁶¹早在民國五十九年即規定全國各校均懸掛中央文物供應社及正中書局印製之總統玉照，及正中書局發行之國父遺像，經過民國六十二年退出聯合國政治局勢波動，台灣省政府更於六

⁵⁸ 彭瑞金，「台灣民族運動與台灣民族文學」，李鴻禧編，國家認同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頁 66。

⁵⁹ 江炳倫，「台灣地區的政治教育」，台灣的教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自立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二刷），頁 101。

⁶⁰ 請參閱：洪振華，「廿世紀台灣師範教育與國家認同塑造」張貼於 <http://www.ed.ntnu.edu.tw/~seph/1029-2.htm> 網站。

⁶¹ 依據蔣中正於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十二日，所發表：「對國民教育小學『生活與倫理』中學『公民與道德』課程之指示」一文，表示對於國中小學生教育的目的：首先在教育學生成為人之所以為人，並生活與行動得像一個人，成為一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次之，則在教育學生成為一個愛國家，愛同胞，合群服務，負責守紀，且足以表現中華民族道德文化，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從此全台灣地區各中小學，多有以「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作為教育指導原則，並行之多年而不墜。

十四年訂定「台灣省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案」作為台灣省所屬機關學校加強民族精神教育之依據，其實，這段時間注重精神教育的規定甚多，因此在國民中小學校區，總是可看到川堂懸掛四維八德的匾額、蔣公銅像，校名、大樓、禮堂的名不外是「中山」、「中正」，「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堂教室內懸掛的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三民主義萬歲」之類的標語，從種種教育政策中可看出台灣國民教育充滿著「民族精神」、「政治教化」的意識型態，獲得的成效是：台灣學生對領袖的感情特別強烈，而各級學校也刻意地不停地在鼓勵此種感情的滋長。國家透過學校這個具體場所來凝聚國民意識、鞏固國家的合法性與社會的凝聚力，學校在當時的台灣，是傳播意識型態或轉化意念精神為實踐上的重要角色。⁶²

再以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國民教育法」為例，該法攸關國民在成長過程的養成，就明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採九年一貫制，應以民族精神及國民生活教育為中心」（第七條第一款）。⁶³顯示兩蔣時代對於民族精神教育以法律定之的明確舉措。

就兩岸局勢而言，在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在面對大陸時，在政治上，是將自我定位為民主自由，企圖與大陸的極權奴役區隔；在經濟上，將自我定位為民生主義，意圖與大陸的共產主義區隔；在統治上，則自認為是堅持法統，依中華民國憲法進行合法統治，視大陸為叛亂團體；由這些因素，糾葛成在文化意識上，以中華文化之繼承與發揚者自居，認為中國有一「道統」，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中華民國即為這個文化傳統的繼承者。在這種架構下，政府自然就會不斷加強民族精神教育，例如在國文教材中教忠教孝、編印《文化基本教材》，供學生誦讀孔孟學說，並在中小學實施公民倫理教育等等，以作為加強民族精神

⁶² 蘇瑛慧，「銅像哪裏去了？（上）」，張貼於：<http://iwebs.url.com.tw/main/html/lipo1/43.shtml> 台灣立報網站。

⁶³ 台灣省新聞處編印，教育發展與文化建設，頁 253。

教育之工具。⁶⁴

在兩蔣時代，對於台灣族群認同的教育，若由國中、小學人文教育內容分析，也可顯示當時國人對於國家認同的塑造過程及普遍的國家認同觀，學者戴寶村就分析這一時期的國中、小人文教育內容與政策如下：⁶⁵

（一）、黨國宰制的國民教育

三民主義與民族精神教育成爲主導人文課程的核心理念，使得教育帶有濃厚的泛政治化現象，如主義教條、領袖崇拜、國家主義，使政治法統與文化道統相結合，作爲與中共政權相抗衡的張本。甚至在一九七〇年代外交益形孤立、島內分離意識高漲後，更形加強此一趨勢，希望達成防微杜漸的效果。

（二）、官定課程標準

國中、小的國民義務教育，尤其以人文教育或歷史教育的影響最爲深遠，攸關人民的國家認同觀念塑造，而兩蔣時代國中、小的歷史、人文教育課程標準及目標都由官定。

戴寶村也分析認爲，當時國中與國小歷史教育課程標準與目標相似，以國小歷史教材爲例，課程標準訂有：1、總目標：指導兒童從歷史的演進中，明瞭中華文化的淵源與現代生活的關係，以培養愛民族、愛國家的情操，發揮團結奮鬥、合作進取的精神。2、教材綱要中（第七項）有：台灣與大陸，包括台灣的地理環境和台灣歷史發展，後者的內容有（1）蔣總統與台灣；（2）國父與台灣；（3）清廷與台灣；（4）鄭成功與台灣；（5）明代以前的台灣；（6）其他。課程目標具有如下特色：（1）塑造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和愛國情操；（2）強調中台關係，而台灣是復國的基地，對學生灌輸「台灣是中國的台灣」，並非他們生長的台灣；（3）「偉人」與台灣歷史的結合：台灣是「偉人」光復、建設的台灣；（4）

⁶⁴ 請參閱：「臺灣的故事-文化篇：在中與西、傳統與現代之間」，張貼於：
<http://www.gio.gov.tw/info/taiwan-story/culture/down/3-3.htm> 網站。

⁶⁵ 戴寶村，「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李鴻禧編，國家認同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8~119。

台灣史的教育作為反共、抗共的政治教育。等等。

另由洪振華研究師範教育內容，所反映出當時對於民族精神教育的推動可以發現，過去長達五十年來台灣的歷史教育是以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做為歷史教育的主軸，自一九七二年起更將中國近代史列為師專生必修的課程；一九四五年以後台灣教育更是相當重視中國史部分，因為這是形塑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而負責教化全台族群（民族）認同扎根工作的師範教育課程，就明顯的看出非常重視國文、國父思想、軍事訓練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亦即非常強調政統（三民主義、軍事訓練、黃埔精神）與道統（國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吸收與傳承；換言之，就是把政治上的國家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精神相結合以塑造師範生的國家認同，直到九〇年尚有其遺緒。⁶⁶

學者范信賢亦指出，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前一年，於一九四八宣布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而戡亂時期，對國民教育政策的影響極其巨大，其特色是以反共復國為首要，具體的表現就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實施。⁶⁷

范信賢更依據瞿海源分析一九六六至一九九三年教育部歷年的施政報告，認為台灣教育的第一大問題是「威權性格」，而反應在教育政策上即是特別加強及不斷強調民族精神教育。尤其認為，蔣中正在政府遷台後，檢討認為國民政府大陸失敗的主因在教育，而教育失敗的三大原

⁶⁶ 請參閱：洪振華，「廿世紀台灣師範教育與國家認同塑造」，張貼於 <http://www.ed.ntnu.edu.tw/~seph/1029-2.htm> 網站。洪振華研究發現，在九〇年代起，民主化、多元化、國際化、本土化的聲音雖已逐漸興盛，但國民黨所長期堅持的國家民族認同塑造卻毫不見放鬆，這可從師範院校的課表看出；以 1994 年「師資培育法」修正後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課程結構為例：在 32 個共同必修學分中，國父思想、國文、中國通史、中國現代史竟然佔了超過一半的十八學分。相對的有關台灣本土斯土斯民的觀點似乎未受到重視，甚至也不如日據時期對台灣語和台灣文化的學習。

⁶⁷ 范信賢，「國民教育中的國家角色初探：

『以學生為主體』的省視」，張貼於：<http://www.naer.edu.tw/issue/j1/v16n2/60.htm> 網站。

因：第一是忽視國家觀念、民族思想、道德教育；第二是缺乏革命精神；第三是未能實現三民主義教育政策。這種思維，也反映在教育部歷次頒佈的課程標準、全國教育會議和「生活教育實施方案」、「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案」的內容中，甚至到蔣經國主政時期的一九七一年，教育部頒佈的「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案」中仍維持：「民族精神在教育中生根，屹立不搖，纔能使全國人民深知體認『四維』『八德』之真諦，從而培養篤實踐履之優秀國民，成爲堂堂正正忠勇愛國的國人，以國家的國魂爲自己的靈魂，以民族的生命爲自己的生命。」云云，顯見其一貫性，總而言之，民族精神教育是光復後臺灣地區國民教育施政的重點。在兩蔣的大力推動下，民族精神教育成爲遷台後台灣國民教育的文化霸權。而在兩蔣時代，國小社會科教科書的內容，更主要包含了六種意識型態：「傳統導向」、「反共第一」、「國家至上」、「領袖崇拜」、「漢族中心」及「男性獨尊」。這些意識型態，其實都和「民族精神教育」有很大的關係。一直到民國八十年代宣布結束「動員戡亂時期」，才逐漸的減緩。⁶⁸顯見兩蔣時期，在台推動中華民族認同工作之努力。

歷史學者張洋培認爲，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撤退至台灣之後，把具有漢族沙文主義特色的「漢族帝國主義」歷史觀帶入台灣。於是，從小學到大學的歷史教育，全變成了「中華民族精神教育」的工具，同時也是反攻大陸思想的基本教育工具。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國立編譯館主編、熊秉真編輯、李國祈總訂正之國民中學《歷史》課本之〈編輯大意〉，仍然強調：「本國史除敘述中華民族的演進，疆域的變遷，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外，尤其強調悠久的歷史和民族文化的融合，藉以增強愛國家、愛民族的情操與團結合作的精神，並認識民族的傳統精神、國民的地位與責任。」張洋培認爲，台灣人因而被迫學習頌揚這個外地（或外來）政權「悠

⁶⁸ 請參閱：范信賢，「國民教育中的國家角色初探：『以學生爲主體』的省視」。

久的歷史和民族文化」，並且被逼去愛這個國家，以及愛這個民族，⁶⁹更被迫成爲這個民族的一份子。

兩蔣除掌握教育體系進行中華民族認同的教育外，依據前述蔣氏父子依憑列寧式的黨國統治系統，蔣氏父子可隨意將其意旨，透過黨國體系轉換爲對包含教育體系內外的全台人民進行族群認同的教化工作，而對於台灣人民的族群認同政策談話，也代表著兩蔣時代有關族群認同的工作重心，蔣氏父子對台灣人民「變回中國人」認同族群認同政策重要政策與講話，計有：

蔣中正：⁷⁰

對中共進行攻擊：「今後教育更要強調民族主義『救國』的口號，來發揮民族獨立的精神，加強國民愛國的道德」（1951）、「今後我們的教育，應該特別注重精神教育和生活教育，並應以民族主義教育爲基礎，以發展民權主義教育和民生主義教育，來承擔反攻復國的神聖使命。-----反攻復國的根本之圖，希望教育界領袖人士，一齊把民族主義教育來作爲反攻復國教育的基礎」（1962）。

對台民進行教化：「建設的步驟由新的教育-----新的國民-----新的鄉村-----新的社會-----新的國家（由內而外，逐層發展）。建設的內容（包含）現代化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爲基礎，作育智、德、體、群的健全青年，貫徹倫理、民主、科學三民主義的文化建設）」（1963）、「人人自覺、自愛，人人自立、自強，成爲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爲社會人群服務的現代國民」（1968）、「我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

⁶⁹ 張洋培，「從歐美經驗談台灣應如何建立自主之歷史價值觀」，張貼於：

<http://eusa-taiwan.org/06Publication/Annual%20Essays/Annual%20Essays2002/AE0202%E5%BE%9E%E6%AD%90%E7%BE%8E%E7%B6%93%E9%A9%97%E8%AB%87%E5%8F%B0%E7%81%A3-%E5%BC%B5%E6%B4%8B%E5%9F%B9.doc> 台灣綜合研究院網站。

⁷⁰ 張貼於：<http://chungcheng.org.tw/thought/class06/0027/0004.htm>

育青少年子弟如何做人，並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1968）。
等等。

蔣經國：

對中共的攻擊：「共匪敵人更是處心積慮要戕滅民族文化的生機，決斷國家生存的盛軌，因此今天我們必須為國家民族而奮鬥----」（1978）⁷¹、
「時時刻刻以這民族正氣做為自己的衷心主宰，來掃除一切邪惡，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1980）⁷²、「大陸億萬同胞個個和我們骨肉相連，手足相關，不容我們隔岸觀火」（1983）⁷³。

對台灣民眾的教化：「----台灣的光復，使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和民族文化歷史生命，更加融合在一起，血肉相連，精誠交感」（1978）⁷⁴、
「我還希望青年同學們，要能不忘本、不忘恩。所謂不忘本，就是不忘國家民族文化的根，以做一個真正有為的中國人為榮----」（1979）⁷⁵、
「今後在學校從事訓導工作，要強調：第一是國家：就是發揚民族精神，培養愛國的情操」（1979）⁷⁶、「台灣奮鬥歷史和中華民國的建國歷史不能分，台灣的同胞與大陸的同胞也不能分」（1981）⁷⁷、「我們都是中國人，只是到台灣的時間有先後不同而已」（1981）⁷⁸、「（教師應該）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培養具有堅定民族意識的國民，積極參與國家建設」（1982）⁷⁹、「台灣的光復，不僅是台灣同胞重回祖國懷抱、成為堂堂中華民國的國民」（1984）⁸⁰、「台灣本地人事實上也都是中國人，所以根

⁷¹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七年言論集，頁 19。

⁷²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九年言論集，頁 122。

⁷³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二年言論集，頁 63。

⁷⁴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七年言論集，頁 82。

⁷⁵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八年言論集，頁 59。

⁷⁶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八年言論集，頁 215。

⁷⁷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年言論集，頁 45。

⁷⁸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年言論集，頁 222。

⁷⁹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一年言論集，頁 116。

⁸⁰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三年言論集，頁 57。

本無所謂『台灣化』的問題」(1985)⁸¹、「在面臨挑戰之時，都會想到，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我要為中國人爭一口氣」(1986)⁸²。等等。

國民黨主政下的台灣省新聞處，曾綜合兩蔣時代，在教化台灣人民認同中華民族的政策與成果如下：⁸³

(一)、光復以後數年：

主要在去日本化，同時實施「祖國化」教育，除調整學制與中華民國「六、三、三、四」學制相符合外，更積極推行國語政策，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三十六年改組為省政府)教育處(後改為教育廳)內，設國語推行委員會，以中小學教師、公務員及一般民眾為對象推動，成果極佳。

(二)、政府遷台初期：

蔣中正認為大陸的失敗，主要是未能貫徹實行三民主義的教育政策，教育部遵照指示，在民國三十九年六月訂頒「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並依據此綱要，於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六日全國教育行政會議中通過「教育改造方案」，其主要內容計有「台灣省各級學校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等四種，次第施行成效頗佳。

(三)、復國建國階段：

在奠下「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基礎後，教育政策才配合台灣經濟建設的需要，依此基礎，朝向擴充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等方向發展。

這些政策與成果凸顯出，兩蔣時代有計畫的在台推動民族精神教育，塑造中華民族認同的形貌，在蔣經國時代晚期台灣民主化以前，達

⁸¹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四年言論集，頁131。

⁸²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五年言論集，頁9。

⁸³ 台灣省新聞處編印，教育發展與文化建設，頁33~40。當時推行國語的工作，主要從下列幾項辦理：1.辦理中小學教師的國語訓練；2.辦理公務員的國語訓練；3.直接向民眾傳習國語；4.推行注音符號；5.推行標準國語；而國語運動的推動成功，為國民黨政府進一步在台灣加強傳統文化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及政治制度運作教育奠定了基礎，而共同語言的建立，在族群認同及國家認同工作上更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成了將台灣「去日本化」，使台灣人民自我認同轉為中國人的目的。

論者認為，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年公開主張民族同化，希望將「滿、蒙、回、藏同化於我們漢族，成爲一個大民族主義國家」，一年半後的國民黨宣言：「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積極的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已經沒有「同化」二字，其後亦不再明白的主張同化，反以尊重其他族群的差異作爲施政的重要參考依據，而認定政府在台的族群政策，在政策面上已不強調同化，而強調「異中求同」，而所謂求同，則以教育及語言政策作爲重要工具，尤其透過民族教育精神的加強，強化民眾的國家認同和效忠，而且認爲在民進黨出現之前，以國民黨的權力釋出予台籍人士，作爲統合台籍人士手段，在民進黨成立後，則將政府權力釋出予台籍人士，作爲統合台籍人士的手段，使得國民黨早期對台民族政策具有「協和民主」的徵兆。⁸⁴

綜觀國民黨兩蔣時期的族群認同政策，在政策層面上，政府雖不強調同化，而採取類似「異中求同」的政策，而其「同」的部分，主要是在建立國家認同和效忠，是透過民族精神教育的加強，強化民眾的國家認同和效忠，就成了兩蔣時期在台最重要的族群認同政策，兩蔣時代的這種族群認同政策，顯然以「同」爲最明顯努力方向，其中以統一的語言政策最爲明顯，讓國語成爲溝通工具，更讓學習國語、國文成爲台灣住民吸收中華文化並從中形塑中華民族認同的工具，⁸⁵而以「異」作爲不得不的妥協，如表示尊重但卻成果不彰的原住民文化政策等，這種作爲，凸顯國民黨政府兩蔣時期，對於轉變台灣住民的族群認同爲中國人認同的強調，同時也凸顯兩蔣時期利用其黨國專制體制，壓抑台灣住民發展「台灣民族認同」的企圖，雖大部分成功，但因不得不的妥協，留下「異」的部分，而成爲日後反對力量的根源。

⁸⁴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頁 169~175。

⁸⁵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頁 170。

根據國民黨的族群認同作為，若以「同」的角度看待台灣族群認同的問題，會發現在台獨運動大量衝擊之前，台灣整體在教育與社會層面上，對台灣地區族群融合情形有良好表現，⁸⁶但因為保留「異」的部分，並對其妥協的結果，就是保存台灣多元的社會觸媒，而這樣一個多元社會的台灣，其族裔意識和認同並未隨現代化的進程而減弱或消失，卻隨著政治競爭的需要，將族裔意識變得日趨工具化和政治化，使族裔意識成為追逐政治權利的工具，在此政治化與族裔意識變遷的過程中，使得台灣意識變成對中國認同和國家整合的一大挑戰。⁸⁷

三、制度認同面：

兩蔣對於台灣是中華民國一部份的論述，是兩蔣在台灣向台灣人民推行「中華民國國家認同」的基礎。

兩蔣時代對於台灣屬於中華民國一部份的立論基礎，大體有，國民政府一九四一年發表對日宣戰文告，提及：「--- 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間者，一律廢止，特此公告」。依此文告，涉及台灣主權割讓的「馬關條約」，即已遭中華民國單方面廢止，隨後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聲明戰後台灣、澎湖將歸還中華民國；一九四五年「波茨坦宣言」言明「開羅宣之條件，必將實施」，⁸⁸這些文件所推論出的台灣屬於中華民國論述，雖受獨派人士質疑，並提出台灣主權未定論的獨派理論，但亦有論者以為國際法有關「保持占有主意」(principle of *uti possidetise*)原則，認為中華民國政府長時期保持並占有台灣，而具有台灣的主權，同時亦提出日本放棄台灣主權雖未明文規定台灣屬誰，但在一九五九年日本與中華民國和約中，有些條款以台灣屬於中華民國為前提，而認定

⁸⁶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頁 171。

⁸⁷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頁 176。

⁸⁸ 國史館編印，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上）（台北：國史館，2001）頁 2。

台灣屬於中華民國毫無疑義。⁸⁹

中華民國領導人的蔣中正、嚴家淦與蔣經國等人，對於台灣主權屬於中華民國的理念，當然是基於台灣主權確為中華民國所有為前提，且毫無妥協與動搖的餘地，並因認定台灣是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在台灣是中華主權管轄範圍的思維下，中華民國之所有政治制度的安排，當然也必須在台施行，住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人民，當然也必須要對中華民國政治制度進行認同與效忠。這種認同與效忠，自然就是兩蔣時代對於在台灣進行的制度認同最重要的思維基礎。

依據前一章江宜樺對於制度認同的定義，是指：「一個人對於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肯定而產生的政治性認同」，因此，台灣民眾在兩蔣時代，如何在無選擇的狀況下接受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安排，並進行認同，就成為本節討論的重點，而政治制度的安排、接受、認同，更攸關經濟與社會制度的發展，所以，以政治制度的認同作為制度認同的指標，可在制度認同討論領域中，獲得相當程度的信度（reliability）與效度（validity）。

眾所周知，教育對於制度認同的推動具有無法磨滅的效用，以當時做為下一代重要影響因素的師範教育為例，可進一步看出兩蔣時代對於制度認同推動自學生教育做起的用心。

國內學者洪振華研究結果就認為，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非常著重從師範生的精神、生活訓練上，培養其對統治當局的國家認同，如：⁹⁰

一九四七年台灣省教育廳頒行「台灣省師範生訓練實施方案」，其中包含精神訓練、生活訓練、學科訓練及專業訓練四種。

⁸⁹ 丘宏達，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1995），頁 533～534。

⁹⁰ 請參閱：洪振華，「廿世紀台灣師範教育與國家認同塑造」論文，於 2002.10.29 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九樓發表，「第四屆教育哲史討論會」提出，張貼於：
<http://www.ed.ntnu.edu.tw/~seph/1029-2.htm> 網站。

在精神訓練方面著重三民主義信仰與清除日本化影響。在一九五三年，爲了配合國民政府的教育改革方案，訂定了師範學校公民訓練實施大綱：一年級以實踐新生活要項爲重點；二年級以實踐青年守則爲重點；三年級以實行民權初步爲重點。

由這三大綱分析可看出，實踐「新生活」與「青年守則」，就是實施蔣中正從二次大戰前所一貫倡導的運動，而實踐「民權初步」，則是實踐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思想，亦即當局以黨義思想作爲師範生精神訓練的信條，建立師範生對於黨的認同，並視對黨的認同爲對國家的認同。

到了一九四六年，台灣省教育處更調訓台籍教師，施以六週的暑期訓練，其中「精神訓話」的課程係以黨義爲主（國父遺教、總裁言論十二小時，中國國民黨政綱政策、中國國民黨黨史及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之組織及使命、黨員須知等各二小時），這是黨義思想主導精神訓練的實例。

在生活訓練方面，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把師範學校當做軍事學校辦理。其目的在於培養精神國防的尖兵，所以師範學校不但採公費、一律住校、實施軍事化管理，而事實上軍事訓練也是從一九五一年起在各師範學校開始試行，其後再推展到各中等學校。

這種軍事管理、訓練式的教育，從四〇代延續到八〇年代大體未變，而這種生活訓練也使師範生服從權威、思想一元化並降低了接觸自由思想的機會，自然有助於國家認同的塑造。

一九四六年起台灣省地方幹部訓練團分批調訓中小學教師，給予思想指導、生活指導及品格考核。中國反共救國團則自一九五二年起與教育廳配合辦理軍訓業務，同時它也可以動員全國青年學生，參與各項活動。這些特定的機構對師範生並非提供教育專業知能，而是傳授當局所要求的思想與信仰，貫徹當局交付的任務。

由師範教育著手推動師資對於以國民黨、三民主義及其相關政治制

度的認同，目的當然是透過這些師資，向下一代的台灣住民推動制度認同，其成果事實證明在當時是極成功的。

專研公民教育的學者張秀雄也認為，我國自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亟思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新中國，因而創立三民主義之後，三民主義所倡導的自由、民主、理性、平等、博愛與主權在民等思想的內涵，就成為「北伐統一」之後公民教育的中心思想，三民主義的意識型態一直是宰制公民教育的力量，直到民國八十年代才逐漸淡化。而共產黨占據中國大陸，臺灣地區在蔣中正領導下，一方面實施反共教育，防止共產主義的滲透和赤化；一方面準備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因此，在臺灣的教育中，除了加強三民主義的思想教育外，形成在政治上實施「戒嚴」，同時也在教育上實施「反共產主義」敵情教育的態樣，其目的，是在維持台灣地區的團結與安定。⁹¹

換言之，兩蔣時代，是透過學校教育體系及社會教育體系（如救國團系統等組織），推動以「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為制度設定張本的制度認同，以對抗共產黨的制度，同時也透過明訂各類公職人員考試，必須應考「國父思想」及「三民主義」等相關課程為手段，對台灣民眾制度認同教育作強化的作為。

兩蔣歷年的重要談話，更發揮了對當時台灣民眾制度認同政策指示及強化既有政策之功用：

蔣中正：⁹²

對於中共的攻擊：「這一次我復職的使命，就是要恢復中華民國」（1950）、「何謂救國？----就是要將----中華民國恢復轉來，成為三民主義獨立自由平等的國家」（1951）、「我們反共抗俄戰爭，是保障獨立自由的民族戰爭，同時也是維護憲政大法的民主戰爭」（1954）、「我

⁹¹ 請參閱張秀雄，「國民中學『公民科』現況之探討」，張貼於：http://www.worldone.com.tw/magazine/07/07_07.htm 網站。

⁹² 張貼於：<http://chungcheng.org.tw/thought/class06/0027/0004.htm> 網站。

們要增進反攻復國的力量，必須建設臺灣成爲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亦惟有在臺灣推行三民主義的建設」（1956）、「爲了解救大陸同胞，恢復他們在憲法上應有的自由、權利和地位，----，使三民主義的現代中國，成爲保衛自由民主的中堅力量，永遠屹立於世界」（1970）、「爲了維護憲法，必須推翻極權暴政，爲了貫徹民主，必須消滅獨夫毛賊」（1971）、「中華民國憲法，就是這一部奮鬥史的見證，亦就是全國國民生存生活的保障，國家民族撥亂致治的總目標」（1972）。

對台灣民眾的教化：「民國三十六年元旦所頒佈的中華民國憲法，確定以三民主義爲立國的本源，這是全國人民共同信守的最高原則」

（1950）、「吾人此後自須繼續不斷的努力，遵憲法的軌道，發揚民主；循法律的範圍，維護自由」（1957）、「我們建國的方針是三民主義，我們救國的方略是國民革命，----，重建中華民國爲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國家」（1949）、「今天國民大會顯著的成就，乃在謀國家法統的昌大」（1972）。等等。

蔣經國：

對於中共的攻擊：「證實了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國自救的真理和事實。並且更加明顯的和大陸共匪政權，形成了仁愛和暴力、幸福和痛苦、光明和黑暗、大是和大非的強烈對比----」（1978）⁹³、「中華民國憲法是全國國民選舉的代表所制訂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依這部憲法而產生的，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是代表全國國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共匪偽政權是破壞憲法，禍國殃民的叛亂集團，絕不能代表中國，更不能代表中國國民」（1978）⁹⁴、「我們的反共是三民主義對共產主義的鬥爭，是自由民主對極權專制的鬥爭」（1979）⁹⁵、「加速消滅共產暴政，將三民主義憲

⁹³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七年言論集，頁4。

⁹⁴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七年言論集，頁49。

⁹⁵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八年言論集，頁92。

政的光芒普照全大陸，這才是所有中國人自救救國之道」(1980)⁹⁶、「凡我中國同胞，爲了保護我們共同熱愛的文化、制度與生活方式，便應人人奮起，做三民主義的鬥士，消滅匪偽暴政」(1982)⁹⁷、「中國必須統一，但必須認同在三民主義憲政制度之下，統一在中華民國的國號和國旗之下」(1983)⁹⁸、「確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全體中國人的公意，是掃蕩馬列邪說的利器，也是中國致富致強的唯一出路和必然歸趨」(1984)⁹⁹。

對於台灣民眾的教化：「中國問題的真正解決，必須使大陸實行三民主義，重建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中國，才能符合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1981)¹⁰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一運動的目標，也就是要把憲法推展實現於全中國大陸」(1981)¹⁰¹、「今天我們從事的反共戰爭，乃是民主對極權、自由對奴役、爲維護歷史正義和人類尊嚴的聖戰」(1985)¹⁰²、「我們必須達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神聖使命，使全國同胞共享自由民主、安和樂利的幸福生活」(1986)¹⁰³。等等。

兩蔣更爲了政權的合法性，都以孫中山信徒自居，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遺教，又是中華民國憲法的軸心，而孫中山先生遺教爲張本的中華民國憲法，積極將中山先生的遺教表現在下列重要憲法精神與設計中：¹⁰⁴

⁹⁶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九年言論集，頁 59。

⁹⁷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一年言論集，頁 100。

⁹⁸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二年言論集，頁 21。

⁹⁹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三年言論集，頁 15。

¹⁰⁰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年言論集，頁 66~67。

¹⁰¹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年言論集，頁 59。

¹⁰²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四年言論集，頁 12。

¹⁰³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五年言論集，頁 149。

¹⁰⁴ 請參閱陳怡如編製，「立國精神與憲法」，張貼於：<http://home.kimo.com.tw/jyfd6113/spirit.htm> 網站。

(一)、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中華民國憲法前言)

(二)、憲法之基本原則，諸如國民主權、權力分立、地方自治團體之制度保障。(釋字第四一九號解釋理由書第一項第九段)

因此，在台灣實行中華民國憲法本身就是制度認同的最重要手段；雖然早在一九四八年起，台灣就已實施戒嚴，並以臨時條款凍結中華民國憲法部分條文之實行，但臨時條款僅凍結憲法部分條文之實施，並未否決中華民國憲法，尤其是以孫中山先生遺教為張本的憲政精神，而這套憲法，在台實施的結果，就成為全台民眾所參與並不得不認同的制度，直到一九九一年修憲及其以後倡議「制憲」，才面臨制度的變遷與認同。

由兩蔣時代，對於國家認同的界定，在制度認同上，與中共形成競爭的對峙，而這種對峙以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蔣經國以總統身份，接受韓國電視記者金泰弘問中華民國的基本國策時，蔣經國從四點來說明最具代表；蔣經國認為這四點基本國策是：第一、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的國家體制絕不改變。第二、我們絕不放棄反共復國的總目標。第三、我們始終站在民主陣營的這一邊，絕不同任何共產政權、集團來往。第四、我們對竊據大陸的共匪偽政權絕不妥協，而且要奮鬥到底，達到我們統一中國的目標。¹⁰⁵

蔣經國時期這四項基本國策的制訂，固然是對於中華民國處理重大外交、內政事項的最重要指導文件，其實，更是宣示中華民國現在與將來走向的最重要指導文件，這種將國家發展目標明確表示的作法，以另一個角度觀察，就有了對台灣民眾制度認同形成強有力的拘束效果，前在蔣中正時代，亦以有限民主的形式，如：基層選舉或部分中央民代補選等等，讓民眾經由政治的參與，接受並認同在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所

¹⁰⁵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六十七年言論集，126。

制訂的政治制度，兩蔣前後的作為，是讓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制度與大陸所實行的共產主義制度進行明確的區隔。

依據前一章所論述，認為在自由主義理想下的政治制度安排、運行及被人民所承認，才是台灣制度認同的重要指標，因此，檢視蔣中正時期，對於蔣中正的制度認同除教化性的推動之外，對於民眾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管道是否暢通，就成了解釋當時制度認同的重要內涵。

早在大陸淪陷前的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在政治制度安排上，就在台正式成立省議會，一直不間斷提供台灣民眾的參與與認同管道，而其遞嬗階段，可分為四，分別是：¹⁰⁶

（一）、自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至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十日之間，為「台灣省參議會」階段。

（二）、自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至民國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之間，為「台灣省臨時省議會」階段。

（三）、自民國四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至民國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制定並公佈「省縣自治法」後，為地方自治法制化前之「台灣省議會」階段。

（四）、自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省縣自治法」，公布後至今，為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規定實施地方自治之「台灣省議會」階段。

另蔣中正根據民國五十五年國民大會增訂臨時條款之授權，爰交由國家安全會議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於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正式公布，開始實行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的增額補選；後於民國六十一年修正憲法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讓總統不受憲法限制，有權辦理中央民意代表在自由地區之增額選舉以及華僑地區之遴選，其後持續維持台灣地區人民參與政治之機會，

¹⁰⁶ 請參閱：林騰鷓，「議會的法律地位」，張貼於：<http://www.tpa.gov.tw/tpa/twcl.htm> 網站。

直至蔣經國時代。¹⁰⁷這種政治制度安排，讓台灣民眾透過政治參與，加入中央政治制度的運行，並爭取台灣民眾對制度的認同。

蔣中正更秉持孫中山遺教，自民國三十九年起，就在台灣陸續實施地方自治，雖在特殊國際、國內環境下，中華民國一直都處在「威權政治」體制之中，由國民黨一黨獨大，但是此期間，仍有其他政黨活躍，如：青年黨、民社黨；這些政黨也具有一部份的影響力，以早期管轄台北市與高雄市的台灣省議會（當時台北、高雄兩市尚未升格為院轄市）席位為例，青年黨、民社黨、無黨籍人士曾佔有百分之十五甚至高達百分之二十四，這些席位大部分是閩南人與客家人，而外省人卻佔很少席位，而這些政治菁英，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年代裡，仍在地方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些政治菁英更有仕紳政治、家族政治、派系政治相互結合的特質，使得地方政治勢力得以與國民黨抗衡或相互利用，直到民國六〇年代以後，台灣地方政治的體質才開始發生變化，由民國六十年的自由民主黨組黨受阻，到民國六十六年的中壢事件，到民國七十二年黨外後援會成立、七十五年民進黨成立，期間政治活動活力豐沛，¹⁰⁸顯見民眾積極參與政治制度的安排，與認同這種制度的遊戲規則，換言之，對於兩蔣時代的制度認同程度是明顯而易見的。在民進黨成立後，逐步與台獨主張合流，開啓另一個制度認同的新頁，有待第四章進一步討論外，若單就兩蔣時代而言，兩蔣政府對於中華民國制度認同的穩固，是不容置疑的。

兩蔣時代控制下的民主政治發展，不僅造就了往後台灣進一步的民主，更在當時化解了台灣民眾政治參與無著的部分民怨，讓國民政府更有效的將台灣民眾納入既有政治制度安排與運行中，也讓台灣民眾對於當時制度認同進一步的落實。

¹⁰⁷ 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頁 201~202。

¹⁰⁸ 趙永茂，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的理論與實際：兼論台灣地方政府的變革方向，（台北：翰蘆圖書，1998），頁 201~205。

四、一個中國國家認同的反動與壓抑

江炳倫與吳文程引用 Samuel P. Huntington 有關因為社會經濟的現代化，會使得革命性與排他性政黨轉變成建設性與包容性政黨，其轉變過程約略是：(一)、變革期 (transformation)，特性是強烈意識型態的執行與專制的領袖；(二)、強固期 (consolidation)，特性是務實化與制度化；及(三)、適應期 (adaptation)，特性是強調專家政治，提供更大的空間供利益團體、異議知識份子及大眾的參與之分類，認為國民黨大約也循此模式發展，到一九六八年才轉進適應期，並再逐漸變成包容性政黨。¹⁰⁹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國民黨是黨國不分，以黨代政，到一九六九第十屆全國代表大之後，才接受黨政分家的概念。¹¹⁰

但這種黨政分家並不代表國民黨已經完全成為民主政黨，對於反對勢力仍保持鎮壓的態度，只有經過多年之後才逐漸由鎮壓轉變成容忍，有論者就主張直到一九八九才在法律層面上正式承認反對黨的成立，¹¹¹甚至有學者認為在一九八七、一九八九年前後，國民黨在自由化與民主化浪潮下，內部民主開始運作，尤其一九八八年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民主化才較過去徹底，¹¹²也因此，蔣氏父子主政時期，國民黨大體維持列寧式的運作模式，所以，蔣氏父子的意旨就是黨的決策，也是國家的決策，兩者之間很難劃分。

依據蔣氏父子「列寧式」的政權運作模式，學者分析國民黨威權統

¹⁰⁹ Ping-lung Jiang & Wen-cheng Wu,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KMT in 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2), p. 75.

¹¹⁰ Jiang & Wu,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KMT in 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p. 84.

¹¹¹ Jiang & Wu,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KMT in 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p. 86.

¹¹² Constance Squires Meaney, "Liber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KMT", in Tun-Jen Cheng & Steph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2), p. 102.

治的基礎，應由五個要素構成：¹¹³

- (一)、高度一致性的統治聯盟：國民黨統治階層的核心，由數量少、階層嚴明、高度政治共識，且高度團結的外省籍統治菁英所構成。
- (二)、嚴密的社會控制：國民黨一方面以國家統合主義之架構，將社會各部門「細部化」(atomization)，另一方面又佔據了所有社會性的組織性資源。這種控制網，可以嚴密的防止社會主要部門出現自主性的組織。
- (三)、意識型態的灌輸：利用歷史背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兩岸對峙情勢等，塑造其統治有利地位及動員戡亂體制的意識型態。
- (四)、對本土政治菁英的籠絡與分化。
- (五)、高度滲透的特務組織：足以防制反對人士的形成。

因此，兩蔣時代利用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特性，尤其是一面防堵社會中自主性組織的興起，一方面向被統治者灌輸特定意識型態的方式，成為兩蔣時代維持統治合法性與穩固性的必然手段，由於兩蔣對於一個中國國家認同的堅持，也必然透過這些手段，將其言行轉化為國家各項政策，並與中共進行區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再就台灣過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力量的轉變，有學者概略的以三個時期加以分段描繪：(一)、一九四七～一九六二年，政治力完全控制階段，尤其是二二八事件，引發國民黨政府為生存而採取的控制一切的作為；(二)、一九六三～一九七八年經濟力相對控制階段，是因經濟發展，使得民間力量逐步脫離國民黨的控制；(三)、一九七九年～一九九〇年初，社會運動活躍階段，市民社會逐漸升起，抵抗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統治。¹¹⁴顯然兩蔣時代，前後隨著時空背景的變遷及市民力量的展

¹¹³ 彭懷恩，台灣政治發展的反思（台北：風雲論壇，2000），頁 174。有關國民黨威權統治五要素，是彭懷恩引自：朱雲漢，「寡戰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台灣研究基金會編，壟斷與剝削（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1989 年），頁 142。

¹¹⁴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The Rise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Civil Protests", in Tun-Jen

現，而逐漸失去專制的統治基礎，國家認同的轉變也在這種變化中悄悄的進行，但卻可明顯的看出，這種變化雖然不斷的在進行中，但是直到李登輝於一九八八年接任總統後，才更為激烈與具體，尤其是一九九一年修憲之後，表現更為顯著其變化則有待下一章討論。

兩蔣時期，在主觀上，尤其是對台灣民眾的政治社會化作為上，認為中共盤據中國大陸土地是叛亂行為，因此在大陸淪陷區所行的共產政權制度，是有待平定的叛亂地區，連與中華民國所行五權憲法的制度競爭地位都不存在，而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兩個層面，蔣中正卻常混為一談，但不論其混雜程度如何，其言行與思維所具有的最大的特色，是以三民主義作為思想主軸，不論文化的建設與認同，或是民族建構都是以三民主義為中心，不僅以三民主義為文化認同的核心，更以三民主義作為族群認同的核心。

這種以三民主義認同涵蓋制度認同、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的現象，在國外學者的論述中，早有提及中東、歐洲等等地區宗教與種族的認同常重疊出現的類似現象，甚至涵蓋 (slide) 其他認同的事實，¹¹⁵因此，在蔣中正時代的時空背景中，以三民主義建設作為制度認同與文化認同甚至族群認同的主軸，或以三民主義認同涵蓋、等同於國家認同是極自然的事，更何況蔣中正遺囑中，特別強調的「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及「堅守民主陣容」等幾項，常被蔣經國引用於各類重要文告、訓詞、講話或賀詞之中，將這些「遺教」加以分析，就能理解到其中：

(一)、對於三民主義的實行、國土光復的堅持及民主陣營的堅守，顯然是對於三民主義制度的認同與堅持；

(二)、對於民族文化的復興立場，則是對於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的一再

Cheng & Steph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p. 57.

¹¹⁵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Nevada, 1991), p. 7.

宣示。

這「制度認同」、「族群認同」及「文化認同」三個層面的認同，雖然圍繞在三民主義的論述中，且糾纏不清，但卻也凸顯兩蔣對於傳統中國認同的精神一脈相承，無從懷疑。

兩蔣時代主政者強力的政治社會化，自然是影響台灣民眾國家認同內涵的最重要因素，但也有其反動，其中在內政方面，有學者認為，兩蔣時代在台灣進行了四十幾年的白色恐怖統治，無可避免的干擾台灣重新進入中國歷史主體。¹¹⁶「白色恐怖」的統治方式，讓台灣人民不能、不敢、也不願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已經取得統治中國大陸，並獲得國際社會日盛一日的承認的現實，使得台灣面對中國大陸猶如鎖國，自我封閉的結果，自然與大陸的隔閡日深，而在兩蔣時代，台灣的反對聲音，幾乎完全無力回應，尤其是在整個蔣中正時期及蔣經國時代的早期。雖然兩蔣時代在政治領域中，以威權的手段保護其政權於不墜，但在非政治的領域裡卻蓬勃發展，如活力十足的經濟、受全球矚目的均富、全民良好的教育及維持傳統的中國社會結構等等，都為未來台灣的民主化奠定良好的基礎，¹¹⁷最後造成蔣經國晚期國家認同變遷的結果。

除兩蔣政府強力且主動的對台灣民眾進行「一個中國」國家認同教化工作，讓台灣民眾認同中華民國外，台灣內部足以抵抗這種教化的政治異議活動，也微不足道，早期台灣的政治異議運動，在國民黨強有力的鎮壓之下，實乏善可陳，多半的政治異議運動僅以無組織的鬆散的個體與國民黨對抗，自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的中央增額民意代表選舉，有黃順興、康寧祥、許世賢等人以「黨外」名義參選並告當選，隨後「黨

¹¹⁶ 黃連枝，「台灣在中國歷史主體中的進出」，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海峽出版社，1999），頁 141。

¹¹⁷ Szy-yin Ho, "Walking the tightrope: The ROC's Democratization, Diplomacy, and Mainland Policy", *Issues and Studie*(Taipei), vol. 28, no. 3, 1992 March, p. 3.

外」成爲政治異議勢力的代表，至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前夕，康寧祥開始串連全台的「黨外」勢力，逐漸將「黨外」串連成政團或政黨的雛形，¹¹⁸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後，所謂「黨外」運動積極發展，並於兩年後創辦了「美麗島」雜誌，將「台灣意識」鮮明的反映出來，台灣意識在一九七七年後才逐漸發展爲台獨意識，台灣意識也常被用作從事政治動員的工具，在選舉中尤其明顯。¹¹⁹而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與一九七八年的美麗島事件，更有論者認爲是從事政治與文化的反抗運動。¹²⁰

簡言之，在蔣介石時代雖有《自由中國》雜誌爲代表的菁英，以反共無望論試圖挑戰蔣介石以漢賊不兩立爲基礎的一個中國政策，但終究僅是一小部份菁英的政治異議主張，對絕大部份的群眾並沒有發生重大的影響，但時序進入蔣經國時代晚期，台灣在民主化與自由化運動的趨勢下，台灣民眾中很顯著的一部份，在政治異議份子的帶領下，對於傳統一個中國的政治層面上國家認同，及文化層面上的國家認同，都已發生變遷，在族群層面上的國家認同早已以外省人、本省人區別爲名目，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在國際因素方面，則有學者認爲美國因素與中共因素造成國家認同的轉變，其中美國由堅定支持中華民國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隨著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關係，到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與國關係，壓縮了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質疑了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上的合法性，使得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發生了變化，蔣經國爲維持國民黨政府的合法性，也開始被迫實行「台灣化」或「本土化」的改革（雖然蔣經國在民國七十四年七月一日，接受法國「國際政治」季刊發行人兼社長魏斯曼專訪時表示：對於政治人才的選拔與推舉，考慮的是他的才識與品德，以及他是否得到人民的支持，同時台

¹¹⁸ 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頁 495。

¹¹⁹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頁 127~132。

¹²⁰ Tu Weim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in David Shambaugh, ed., *Contemporary Taiw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98), p. 75.

灣本地人事實上也都是中國人，所以根本無所謂「台灣化」的問題。¹²¹但是在蔣經國任內確實是推動了「台灣化」，而所謂「台灣化」，有學者認為是讓台灣人更廣泛的參與，讓國民黨的權力結構更加多元化的意思。¹²²但大體而言，兩蔣時代牢牢掌握台灣是無庸置疑的。

另外中共的因素，則扮演了加強台灣內部國家認同整合的角色；中共主張台灣應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或一個省，這種論調在台灣長期以來一直無法被台灣民眾接受，台灣民眾為抵抗「一國兩制」的安排，在某種程度上轉而更加堅強防禦其既有的各類價值，¹²³遂造成進一步與大陸現行制度區隔的現象。

事實上，一九七〇年代因經濟發展成功所造就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學生等階層，在中華民國政府連續的外交挫敗後，尤感到在政治上的限制，及國際間的侷促，遂形成一股要求政府進行政治改革的力量，其中包含了追求台灣的定位，及爭辯台灣應由大陸人或本省人掌控的勢力，¹²⁴這種要求的出現，才一方面促成了台灣民主化的改革，一方面促成了外交政策的調整，蔣經國推動「彈性外交」就是外交策略調整的重要政策，如：政府在政經分離的原則下，逐步放寬與東歐國家的貿易管制；一九八一年在國際奧會擅自更改我國號、會旗後，我政府於一九八四年以「奧會模式」方式參與美國洛杉磯奧運；一九八六年亞銀又循「奧會模式」更改我會員名稱，我國政府仍於一九八八年派員參加在馬尼拉舉行的亞銀年會，甚至在一九八九年派員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亞銀年會，

¹²¹ 行政院新聞局輯印，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四年言論集，頁 131。

¹²² Hung-mao Tien, "Transformation of an Authoritarian Party State: Taiw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Tun-Jen Cheng & Steph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p. 34.

¹²³ 袁鶴齡，「初探國家認同的外部因素」，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海峽出版社，1999），頁 503~511。

¹²⁴ Murray A. Rubinstein, "Political Taiwanization and Pragmatic Diplomacy: The Ears of Chiang Ching-kuo and Lee Teng-hui, 1971-1994", in Murray A. 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New York: An East Gate Book, 1999), pp. 438~440.

李登輝繼蔣經國出任總統後，又將「彈性外交」改名為「務實外交」。¹²⁵但不論是「彈性外交」或是「務實外交」，所強調的就是中華民國在爭取更大的國際承認與影響力，事實上是追求台灣這個政治實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的現實，¹²⁶所必須的作為是，擺脫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中國唯一合法政權的姿態，對於中華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的箝制，這牽涉及中華民國國家定位的轉變，並從轉變中牽涉及中華民國子民對國家認同的轉變。國家認同自然由蔣中正時代的一元化，朝蔣經國後期的多元化逐漸的發生變化。

總的來說，兩蔣時代一個中國國家認同是穩定而堅固的，但在蔣經國晚期開始了變遷，也造就了李登輝時期開始不同的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

兩蔣時代，對於大陸政策的制訂，是依據「一個中國」做為決策的依據，對於中國大陸以正統自居，用戡亂以對，對於台灣島內的任何反對意見，以鎮壓為手段，甚至對於任何挑戰兩蔣政策的民主政黨都不容許存在，對於台灣島內的政策就成了，一方面兩蔣將心中對於一個中國的主張，以各種方式向台灣民眾進行教化之外，另一方面也以高壓與專制的形式，壓制任何反對這類主張的任何意見。

分期陳述兩蔣早期在台灣短暫出現的反對運動起落，最足以表現出兩蔣對於一個中國推動的決心，也同時凸顯兩蔣時代，台灣民眾除了支持兩蔣的國家認同訴求外，絕無其他任何選擇空間的現實。

(一)、一九四〇年代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固然在事件結束後，台灣省政確實有了

¹²⁵ 林文程，「外在環境發展對台灣國家定位之影響」，黃昭元主編，兩國論與台灣國家定位（台北：學林，2000），頁 438。

¹²⁶ Ralph N. Clough, "The Enduring Influ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in David Shambaugh, ed., *Contemporary Taiwan*, p. 20.

某種程度的改革，但在國民黨血腥鎮壓下，台灣政治菁英幾乎全部被剷除，因此「二二八事件」結束以後的這段期間，台灣地區的反對運動始終呈現暮氣沈沈的景象。¹²⁷

（二）、一九五〇、六〇年代

《自由中國》雜誌所引發的相關事件，常能做為蔣氏父子威權統治台灣的證據，事實上，《自由中國》雜誌負責人雷震，在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時，是國民黨極信任的人物，在抗戰勝利後，還曾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處秘書長，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自由中國》半月刊論證方向，逐漸由原先對中共、俄共的批判，轉移到對台灣內部的檢討，於是與當時的政府疏遠並進而對立，從民國四十六年起，一系列定名為：「今日的問題」之社論，前後共計十五篇：「是甚麼，說甚麼」、「反攻大陸問題」、「我們的軍事」、「我們的財政」、「我們的經濟」、「美援運用問題」、「小地盤、大機構」、「我們的中央政制」、「我們的地方政制」、「今天的立法院」、「我們的新聞自由」、「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我們的教育問題」、「近年的政制理想與作風」、「反對黨問題」；民國四十八、九年間，《自由中國》進一步就「修憲風波」、蔣中正總統二屆任滿之憲政問題；「政黨的承認問題」，討論組織新政黨等等，使得《自由中國》凸顯捍衛理想主義色彩，反對任何限制民主的作為。¹²⁸

雷震終於觸犯蔣氏父子統治的禁忌，而遭台灣警備總部於一九六〇年九月四日，以叛亂的罪名逮捕雷震，及《自由中國》編輯傅正等人，這也使得自使得一九五〇年代逐漸升起的反對運動歸於沈寂。¹²⁹

（三）、一九七〇年代

一九七〇年代，反對運動的組織化才又重現生機，主要原因是，來自於台灣經濟發展造就大批中產階級，使得政治參與要求與日俱增，另

¹²⁷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1992），頁41。

¹²⁸ 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頁264~268。

¹²⁹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頁41。

一方面，因美國全球戰略的改變，使得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連續挫敗，及蔣經國既將接任行政院長，面臨政治權利轉移的關鍵時刻，台灣地區的政治改革呼聲乃應運而生，這些改革大致藉由《大學》雜誌的凝聚，與參選公職作為兩個發展方向。其中論政的《大學》雜誌，在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後，因言論的被迫緊縮而分裂，部分人士被國民黨吸收，部分人士投入公職選舉，而參與公職選舉者，逐漸出現有組織的活動，如：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中旬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黃信介與康寧祥共同推動全島性的串連，並獲得斬獲。一九七八年，針對即將來臨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反對運動人士正式組成「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除提出共同政見外，並巡迴台灣全島助選，已隱然出現政團雛形。一九七九年八月《美麗島》雜誌社創刊，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¹³⁰

國民黨政府面對這些積極挑戰國家認同的有組織反對運動，初期容忍，但最終給予以鎮壓。

（四）、一九八〇年代

「高雄事件」後，受難者家屬及辯護律師，紛紛投入一九八〇年的增額立委與國大代表選舉，並獲選民支持，而紛紛高票當選，一九八一年有「黨外推薦團」的成立，形同政黨提名制度，一九八三年有「黨外中央後援會」、一九八四年有「黨外選舉後援會」、一九八五年有「黨外聯誼會」、一九八六年各地紛紛成立「黨外公政會」，至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正式成立。¹³¹

由「二二八事件」及《自由中國》雷震的事件中，可以看出蔣中正父子統治下的台灣，任何社會力量都不得挑戰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這其中當然包含對於國家認同與大陸政策的挑戰。在蔣氏父子的強力干涉

¹³⁰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頁 42~44。

¹³¹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頁 44。

與威權統治下，台灣的大陸政策與思維除蔣氏父子的政策與思維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政策與思維可言。

在兩蔣的時代裡，政府一再地宣示主權及於中國大陸，且堅持「中國只有一個，就是中華民國，中共只是一個叛亂團體」，即使因此項堅持，被迫退出聯合國也在所不惜。¹³²以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時代為例，當時縱使對於親中華民國的美國學者克萊恩，於紐約客雜誌中公開表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可以考慮兩德模式，就曾遭蔣經國否決，後經幕僚解釋兩德模式中，西德政府並不視東德政府為完全分裂出去的國家，而且還是由西德的總理府，而非外交部接見東德代表，蔣經國才釋懷，可見在蔣經國的思維中，對於台灣已分裂國家的情況來換取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是堅決反對的¹³³。

依據國內學者的研究發現：從長期的利益著眼，威權政體的統治當局，縱使有足夠能力鎮壓反對運動，但只要不立即危及自身的優勢統治，寧可有限度的開放選舉競爭，以平民怨，而國民黨政府在兩蔣時代，依據孫中山先生選賢與能思想的影響，在大陸敗戰後，仍在台灣舉辦地方選舉，此舉，一方面可達到在不威脅其統治穩固性條件下，達成擴大政治參與、降低民怨目的，一方面可強化其一黨獨大威權統治的國內與國際的合法性，甚至利用地方選舉發展嚴密組織，結合一般民眾與社會團體，做為國民黨的統治工具，最終達成鞏固其威權統治的策略決定，這種作為造就了台灣不間斷的地方性選舉競爭，進而保存了反對運動的基本運作力量，而這些反對力量卻隨時空背景的變遷逐步發展成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終至威脅國民黨的統治，並迫使國民黨質變。¹³⁴

¹³² 葉金鳳，「『一中各表』乃國家最大利益之所在」，蘇起等主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史實（台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2），頁 98。

¹³³ 魏鏞，「兩岸關係，蔣（經國）有前瞻，也有堅持」，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三日，版 15。

¹³⁴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頁 138、146、147、158。

國外學者也認為，國民黨統治台灣初期積極發展經濟，並有意無意防堵台灣內部中、小企業與政治統治階層過份親密，甚至保持距離的作法，讓台灣中小企業不受政治勢力控制而獨立於國民黨政權之外，國民黨的經濟政策讓台灣中小企業實力的逐漸成長，卻也讓國民黨更加失去對其控制的力量，外加經濟發展所造就的中產階級力量，¹³⁵這些都促成了蔣經國晚期才出現的台灣民主化，及敢於挑戰國民黨統治的結果。

學者李筱峰對兩蔣時代的國家認同所做出研究，也約略呈現如此的走向，李筱峰認為：¹³⁶

(一)、五〇、六〇年代白色恐怖案件中的兩種國家認同

一九四九年底，在二二八事件後的五〇年代起，即進入所謂「白色恐怖」的統治時期；自五〇年代起，至一九八七年解嚴止，台灣出現了二萬九千多件的政治獄，在這麼多的政治獄當中，其中提出與統治當局不同政治主張的異議分子，在國家認同的立場上，大致分成兩種，一為期待北京的共產政權「解放」台灣；另外是，希望促使台灣獨立；這兩種不同的國家認同態樣，分別做如下的呈現：

1.對中共充滿期待的左翼運動

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案件中，約有數百人在國家認同上是傾向北京中共政權。這種國家認同，實在是因為基於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共同認同所致。¹³⁷

¹³⁵ Tun-jen Cheng & Stephen Haggard, "Regime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Tun-Jen Cheng & Steph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2), pp. 9~10.

¹³⁶ 李筱峰，「一百年來台灣的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張貼於：
http://www.jimlee.idv.tw/art_01_07.htm 網站。

¹³⁷ 依據李筱峰，「一百年來台灣的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張貼於：
http://www.jimlee.idv.tw/art_01_07.htm 網站中的文章中表示，從 1949 年的四六事件起，到 1960 年 9 月的雷震案，十年之間，台灣所發生的政治案件中，約有二千人遭處決，八千人被判重刑，其中除了不到九百人是真正共產黨員(地下黨)之外，其餘九千多人是冤案、錯案、假案的犧牲者。根據這些資料，可以斷定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案件中，約有數百人在國家認同上是傾向北京中共政權。例如，1949 年 6 月陳本江等在台北縣石碇鄉鹿窟村召集同志和村民，建立武裝基地，準備呼應中共「解放」台灣；同年發生鍾浩東等人的基隆中學案；同年底爆發的「台

2.台灣獨立自救的主張

另外一種國家認同是台灣獨立的主張。如：一九六四年彭明敏與謝聰敏、魏廷朝的「台灣自救宣言」案等。

(二)、五〇年代以降的民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

五〇年代中，較敢提出政治異議者，是以《自由中國》雜誌為中心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集團；《自由中國》的國家認同是以大中國為前提的，他們最後的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其所謂的中華民國，是包括整個中國大陸在內。

一九五七年以後，在雷震的主導下，終於有一九六〇年八、九月間的「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後因為雷震被捕而胎死腹中，使台灣民主運動陷入谷底。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國民黨政府退出聯合國的前後，蔣經國準備接掌政權之際，以《大學》雜誌為中心的知識份子要求政治改革，但他們的言論重點在於民主改革，法治人權的提倡，在國家認同上，仍以「中華民國」為認同，但具有要求政府本土化的意義。

該雜誌無明顯的台灣獨立的言論，一般論者則以「革新保台」來形容其政治立場。

(三)、七〇年代以後島內獨立自救的聲音

此階段除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了「人權宣言」，表示要「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之外，在政治高壓下，一般言論仍不敢倡言台灣獨立；七〇年代以降的「黨外」民主運動，除民主憲政、人權法治的訴求外，也挾雜著本土意識，但尚未提昇到明確標榜「獨立」的國家認同層次。直到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運動明確提到「自決」的主張（一九八三年的增額立委選舉，「黨外」的共同政見是「民主、自決、救台灣」），一九八七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後，提出的共同政見第一條即

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案，牽扯出許多為中共政權執行任務的台共人員；其他如 50 年的台大醫師許強、吳思漢、郭琇琮等案皆是。

說：「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以普遍且平等方式共同決定。」此後，主張台灣獨立的聲音，在島內漸漸浮出台面。

對於這些時斷時續的反對力量，有學者的研究指出，從蔣中正到蔣經國統治的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之前，台灣反對運動在專制、極權統治之下，呈現三個特徵：(一)、零星性的，以反對的個別人士間上有相互的競爭與對抗，而無力與國民黨進行組織性的對抗；(二)、季節性的，因法令限制，只有在選舉期間或議會期間，活動才比較活躍，故比較不被社會大眾所熟知；(三)、地域性的，只侷限於地方的反對運動，欠缺全國性的反對運動領袖。¹³⁸因為欠缺組織性的反對運動，對於國民黨國家認同的灌輸與主導，當然也欠缺有力的異議，直到一九七八年後，反對力量才逐漸發展組織，¹³⁹對於國民黨的國家認同訴求，才能夠有足夠的反抗力量，此時也已接近蔣經國一九八八年去世，所以兩蔣時代，台灣反對運動幾乎乏善可陳。

因為反對運動的欠缺，使得台灣民眾接受當時兩蔣所主導的政治教化，將兩岸視為「一個中國」，並認為中國大陸是叛亂地區，必須加以收復的想法，仍是當時台灣主流意識，當無疑義。

而兩蔣就是以此國家認同的推動，及民眾無選擇的接受與支持，作為面對大陸的政策依據，發展出當時的兩岸關係。

第三節 「一個中國」認同下的兩岸關係

在二次大戰後，因兩大強權的各自在背後支持，地區衝突幾乎成為普遍現象，如：兩岸、南北韓、印巴、兩伊、希臘-----土耳其、南北越、伊索匹亞--索馬利亞、東西德等等，這些衝突也幾乎與領土的再統一有關，政治領袖要同時面臨「敵方」、「背後的超強」及「本身內部政治反

¹³⁸ 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民主化，頁 42~43。

¹³⁹ 請參閱黃德福，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民主化一書，第 46 頁，表 2-1，可清楚看出反對運動自 1987 年起組織化的狀況。

對勢力」等三方面，在國家再統一議題上的壓迫。¹⁴⁰

在兩蔣時代的兩岸關係，基本上就是這個世界局勢下的產物，兩蔣爲了中華民國政權的生存，必須與「敵方」持續對抗，在國際大環境中，更必須配合「背後的超強（美國）」圍堵大陸共產政權，所以對於「本身內部政治反對勢力」的鎮壓就必須堅強而有力，尤其是對於危及其對中國法統地位的國家認同勢力與意見的鎮壓，也絕不能手軟。

換言之，在冷戰時期，兩蔣透過專制與極權方式，將台灣「本身內部政治反對勢力」鎮壓下去，也透過專制與極權的運作模式統合台灣人民爲「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並依據這種單一的國家認同所結合的力量，轉爲美國這個「背後超強」的代理人，與大陸進行領土再統一的鬥爭，因此，使得兩蔣時代的兩岸關係是以不斷的衝突，作爲基本呈現的現象。

雖然，蔣經國晚期，以「台灣化」、「本土化」做爲國民黨政權延續的重要手段，甚至出現與反對運動勢力爭相搶奪本土化票源，甚或有因此改變再統一政策執行方式的跡象，如蔣經國晚期規劃解除戒嚴，就是明白的宣示承認中共統治大陸地區爲一個政治實體的表現，相對於以往的戡亂態度，實有天壤之別，但無可否認的是，兩蔣時代的絕大部分時間，仍是以傳統「一個中國」政策的國家認同作爲對大陸的政策張本。

在兩蔣時代，兩岸均以「一個中國」作爲面對對方的政策主軸，雖然其中所表彰的「一個中國」各自不同，但兩岸都以防堵台獨作爲基調，雖然，中共甚且利用台獨作爲擾亂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手段，但僅僅是手段，卻絕不容許台獨的實質存在，而對台獨的防堵成了兩岸的共識。

中共對台政策雖手法不斷變更、變新、變靈活，如：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強調武力解放台灣爲政策主軸時期，其中又包含自一九四

¹⁴⁰ Chi Huang, Woosang Kim & Samuel Shiouh Guang Wu,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1951- 78", *Issues and Studies* (Taipei), vol. 28, no. 6, 1992 August, pp. 36~37.

九年至一九五九年的武裝解放台灣時期，以及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八年的「和平解放台灣，但不排除武裝解放」等階段，在一九七九年後，則強調和平統一但不排除使用武力手段為對台灣政策主軸時期，其中又包含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強調三通四流、葉九條、鄧五點¹⁴¹、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七年強調「一國兩制」等階段，¹⁴²但是以「併吞」台灣為其對台政策思維主軸卻始終不變。

若以中共對台政策的不變，則將兩蔣主政時期以「一個中國」國家認同的堅持，作為對大陸政策的主軸思想，分別就國際與兩岸之間的重大事件變動，陳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至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止，正可確認與凸顯「一個中國」國家認同這個因素，對於形塑兩岸關係的影響：

一、以「一個中國」國家認同與中共在國際社會周旋

在兩岸軍事衝突稍歇的一九七〇年代起，國際間企圖以所謂「共存」的方式解決問題，因而有「兩個中國」的論調，主張台海兩岸的中國都進入聯合國取得會員資格，但遭兩岸反對，兩岸並基於對兩個中國的反對，或說對一個中國的堅持，在國際間進行激烈的代表權征戰。¹⁴³

兩蔣時代，在國際社會間依據「一個中國」國家認同原則，與中共的鬥爭計有：

（一）、中日和約簽訂¹⁴⁴

面對國際社會對日舊金山和約，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八日，蔣中正聲稱，我國有權利參加對日和約。同年九月六日，外交部長葉公超抨擊舊

¹⁴¹ 所謂「鄧五點」依據蔡政文、林嘉誠，台海兩岸政治關係（台北：業強，1994年），一書中的陳述是指：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鄧小平在接見楊力宇教授，談及統一問題時提及五點意見：1.統一後，中共不派軍政人員到台灣。2.台灣維持獨立的立法權、現行法律及司法機構。3.台灣維持自己的軍隊，但不能對大陸構成威脅。4.台灣將可維持處理外事的若干權利。及5.台灣可使用特別旗幟及中國台灣的稱呼。

¹⁴² 蔡政文、林嘉誠，台海兩岸政治關係，頁13~36。

¹⁴³ 國史館編印，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台北：國史館，2000），頁125。

¹⁴⁴ 國史館編印，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頁43。

金山和約無我國參與，實予侵略者以鼓勵，而在美國斡旋下，我國與日本於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另行簽訂中日和約，日本不承認中共，只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同年五月五日，中共外長周恩來發表聲明堅決反對關於單獨對日合約及日本與台灣簽訂合約。

(二)、中華民國的反攻大陸政策與堅持代表中國¹⁴⁵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使蔣延黻在聯合國安理會，指責蘇聯提議取消中華民國代表團，是違反聯合國憲章。同年三月二日，蔣中正復行視事，表達鞏固台灣基地光復大陸決心。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蔣延黻公開反對兩個中國論，蔣中正並於同年七月二日、十四日及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公開表示不接受兩個中國觀念。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蔣中正宣稱反攻大陸是弔民伐罪的革命戰爭，同年十月二十三日，中美聯合公報，表明達成反攻大陸的主要途徑，為實行三民主義而非武力。

(三)、中共反對美國親台與干涉解放台灣¹⁴⁶

一九四九年中共外交部長周恩來否認中華民國聯合國代表團的合法性。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周恩來聲明反對美國佔領侵略台灣，並堅決要求解放台灣。十月十日，周恩來向聯合國控訴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台灣，十二月八日，周恩來公開反對中（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十月十六日，國防部長彭德懷在「告台灣同胞」書中，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十月十三日，中共再度指責美國製造兩個中國，台灣必須獲得解放。

(四)、中華民國反對「兩個中國」與護衛聯合國中國代表權¹⁴⁷

¹⁴⁵ 國史館編印，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頁 43~44。

¹⁴⁶ 國史館編印，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頁 44。

聯合國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始於一九六一年的第十六屆大會開始，美國、日本等五國提案，用「重要問題案」方法，既必須得到出席和投票會員之三分之二支持通過，以防堵中共入會企圖。中華民國政府堅決反對兩個中國進入聯合國，並爭取美國的支持，期間美國總統甘迺迪發表聲明，稱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幾年間美國總統尼克森、副總統詹森、韓福瑞、安格紐，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副總統陳誠、嚴家淦、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美國國務卿魯斯克等人相互往訪，台美關係密切，其間，一九六二年中寮斷交，一九六四年中法斷交，都是因法、寮兩國與中共建交，中華民國政府基於漢賊不兩立，絕不製造兩個中國立場而做的決定；一九六六年起，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鼓吹兩個中國，提出對中共圍堵而不孤立政策，中華民國指其為是為「姑息主義」，是年，義大利等七國提議在聯合國內設立研究委員會，研究中共進入聯合國議題，被兩岸共同反對。

自此，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之爭愈顯艱困，至一九七〇年底，加拿大和義大利相繼承認中共，也是中華民國外交情勢逆轉的開始。

（五）、中共反對「兩個中國」與爭取聯合國中國代表權¹⁴⁸

一九六〇年代以來，中共一方面嚴拒「兩個中國」政策，一方面爭取中華民國邦交國的承認，並取代中華民國的法律地位。中共反對「兩個中國」的要點有：1、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分，反對一切台灣獨立、中立和託管的提議，不同意兩個中國，或變相的兩個中國。2、反對任何國家承認「兩個中國」。3、拒絕聯合國兩個中國的安排。中共在六〇年代進入聯合國的努力雖未成功，但情勢卻逐漸對中共有利。

（六）、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與國際外交衰退¹⁴⁹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

¹⁴⁷ 國史館編印，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頁 125~127。

¹⁴⁸ 國史館編印，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頁 127。

¹⁴⁹ 國史館編印，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頁 287~288。

國為聯合國會員國，隨後世界重要國家紛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中華民國以漢賊不兩立的立場相繼與這些承認中共的國家斷交。一九七六年，中共依據在國際組織排除台灣的政策，在奧會中強迫中華民國更改會名。中華民國被迫在國際社會中以務實外交方式，繼續保持與各國文化、經濟各方面的交流合作。

（七）、中共加入聯合國與對外關係的拓展¹⁵⁰

中共加強孤立台灣，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既使在國際組織上亦不放鬆。

（八）、美國對華政策轉變¹⁵¹

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發表「世局咨文」，提出兩個中國的構想，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國國務院新聞官發佈有關「台灣法律地位」聲明，敦促兩岸直接談判戒絕紛爭，在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常會中，美國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卻反對排除台灣，主張在聯合國中存在兩個中國。隨後，尼克森訪問北平、一九七三年美中（共）互設聯絡辦事處、一九七五年美國總統福特訪問大陸、一九七七年八月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大陸、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一九七九年正式建交，美國以「台灣關係法」維繫美、臺關係。

雖然國際局勢不斷逆轉，但中華民國視中共為叛亂團體，尤其是在國內對台灣民眾的宣傳上始終未見大幅度的改變，顯見雖然國際局勢逆轉，主政者仍維持以「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教化台灣民眾，並依據這種認同在國際社會中與中共周旋。

兩岸都以「一個中國」做為政策主軸，對於對方的法律地位都提出質疑，當然對於對方的主權合法性也提出質疑，兩岸互爭主權涵蓋對方

¹⁵⁰ 國史館編印，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頁 288～289。

¹⁵¹ 國史館編印，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一），頁 289～290。

合法性的結果，當然是在國際間互不相讓，兩岸關係當然也就尖銳對立。

二、以「一個中國」國家認同在兩岸間的對峙與衝突

(一)、不斷的軍事衝突

除了鬥爭不斷的政治事件之外，事實上兩岸更有多次軍事衝突：

表 2~1 八二三砲戰前兩岸軍事衝突一覽表

時間	日期	名稱	地點	軍事威脅方式	事件	結果	備考
民國 38 年	10.25	古寧頭戰役	金門	兩棲登陸攻擊	共軍於古寧頭登陸後激戰三日	共軍死亡八千人，被俘六千人，遭到挫敗。	
民國 43 年	9.3	金門砲擊（第一次台海危機）	金門	砲擊、海、空戰	一、海軍於 7 月 2 日在浙海白沙山附近擊沈中共艦艇兩艘。 二、海軍 8 月 9 日掃蕩東山島，擊毀中共艦艇十二艘。 三、中共 9 月 3 日向金門砲擊。 四、空軍噴射機群首次出動，飛廈門上空作戰。	國軍選定大陸特定目標還擊。	12 月 2 日中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
民國 44 年	1.19 2.17	一江山戰役、大陳撤退	一江山島、大陳列島	兩棲登陸攻擊 兩棲登陸攻擊	中共對一江山、大陳列島進行攻擊	一、一江山島淪陷，國軍七二〇人全部成仁。 二、大陳列島撤守陷共。	1 月 25 日美國會授權艾森豪總統使用武力保護台灣。
民	8.23	八二	金門	砲擊，封	一、47 年 6 月起馬	一、國防	9 月 4 日

國 47 年		三砲 戰 (第 二次 台海 危 機)	馬祖	鎖金、 馬，海空 戰鬥。	祖即已發生海空激 戰。 二、47年8月23 日起，中共猛烈砲 擊金、馬，並發生 海、空戰鬥。	部長受 傷。 二、三位 副司令官 喪生。 三、擊落 米格十七 共三十一 架。 四、中共 宣布對金 門「單打 雙不 打」。	美國國務 卿杜勒斯 發表聲明 協防金 門。
--------------	--	--------------------------------------	----	--------------------	---	---	-----------------------------------

資料來源：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台北：揚智，1996），頁 154

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之前的兩岸關係，中共是以「武力解放台灣」為主軸，在「八二三砲戰」之後，因美國的支持台灣，加上中共在六〇年代陸續發生與蘇聯決裂、與印度國界糾紛、爆發文化大革命等問題，無暇也欠缺實力用武力解放台灣，以致中共對台政策改以「和平解放台灣」為主軸，隨後中共進入聯合國，才又進入利用與美國改善關係解決台灣問題的階段。¹⁵²

（二）、強調法統之爭

於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間，改軍事衝突為法統宣示之爭最為明顯，此一階段的國內外情勢都已經改變，中華民國政府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代替反攻大陸，作為面對大陸的政策主軸，雖然偶爾提及反攻復國，也不言及武力反攻，反而以三民主義的政治訴求作為反攻的武器。¹⁵³

這種國內外情勢的轉變，包含了：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一九七九年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要

¹⁵² 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頁 151~153。

¹⁵³ 蔡政文、林嘉誠，台海兩岸政治關係，頁 141。

求兩岸「三通」、「四流」、「六不」¹⁵⁴，中共提出「葉九條」，中國大陸與美國建交，中共加入聯合國，中共提議以「一國兩制」做為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法等等；中華民國政府面對中共以和平統一為主，武力降服為輔的對台策略，展開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回應，針對中共的統戰作為駁斥，成為此階段中華民國政府主要大陸政策端倪。¹⁵⁵

依據國內學者蔡政文與林嘉誠以內容分析法分析該時期國內蔣經國、孫運璿、俞國華三位最高首長的八十篇談話內容，發現該時期是不斷的指中共對台的言行「矮化台灣為地方政府」、「阻止美國軍售台灣」、「以和談手段達成軍事手段不能達成的目的」、「用盡方式迷惑國際社會」、「『三不政策』的執行是不讓中共陰謀得逞」、「和談建議是笑裡藏刀」等等負面的回應；而確實執行的「三不政策」也加深了兩岸的隔閡，使得以「黨外」為統稱的台獨勢力不斷在島內增長，在一九八一年後，台灣地區的言論尺度更行開放，台灣民眾在經濟、親情因素影響下，不斷脫離「三不政策」的規範與大陸進行交流與接觸，中國國民黨政府被迫於一九八七年宣布開放探親，是一連串對大陸開放政策的濫觴，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長達三十九年的戒嚴令，以「國家安全法」取而代之，更重要的是，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中國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公開表示，中國國民黨向大陸展開政治反攻，不是要取代中共的政權，而是要促進大陸的政治民主、新聞自由、經濟開放，使中國解除共產主義的桎梏，成為自由民主的現代化國家，這代表著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務實取向，以及緩和兩岸關係的意願。¹⁵⁶

¹⁵⁴ 所謂「三通」指的是通航、通郵、通商，所謂「四流」指的是經濟、體育、文化、科技四類交流，所謂「六不」，依據蔡政文、林佳誠合著，台海兩岸政治關係一書中的說法，是指在一九七九年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所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中，提及「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不改變台灣現有生活方式」、「不降低台灣人民生活水平」、「不更動現有法治制度」、「不更動現有經濟制度」及「不更動現有軍隊」等六項。

¹⁵⁵ 蔡政文、林嘉誠，台海兩岸政治關係，頁 133~134。

¹⁵⁶ 蔡政文、林嘉誠，台海兩岸政治關係，頁 134。

李煥的言論雖然已經脫離「光復大陸」的傳統思維，但卻仍舊希望兩岸未來的統一，因此仍不脫離「一個中國」國家認同的範疇。

有學者認為一九八七年台灣開放探親的原因，除了人道考量與國內輿論壓力外，更著眼於讓台灣居民藉由探親與赴陸經商、旅遊，加強兩岸關係，以阻擋台灣內部日益升高的台獨聲浪，¹⁵⁷顯見兩蔣敵視大陸政權態度雖然不變，但在作為上卻已呈現微妙轉變。

雖有學者指陳，一九八七年以前的「大陸政策」，與其說是政策，不如說是一些原則、立場與政治口號宣示而已。¹⁵⁸雖說沒有具體的「大陸政策」，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就是依據這些以「一個中國」為國家認同的原則、立場與政治口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見招拆招」的相互攻擊作為，來鋪陳兩岸關係。

但總的來說，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七年的兩岸關係，約略呈現如下現象：一九七〇年代之前仍有軍事衝突（如：一九五四年至五五年及一九五八年兩次台海危機，一九六二年的金門上空的空戰及數次較具規模的游擊戰鬥），一九七〇年後，中共改變對台戰略，雖未曾放棄武力解放台灣，但卻逐漸轉變成以「和平攻勢」為主的對台策略，其中最高潮就是一九七九年的告台灣同胞書，¹⁵⁹兩岸關係，顯然是由激烈的軍事衝突逐漸轉變為和平競爭，但相互消滅對方的意圖卻從未改變，只是手段更為靈活而已。

更重要的是雙方對於「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從不鬆動，並將此國家認同作為面對對方的基礎，發展出當時的兩岸關係，這可由下列兩岸對於兩岸問題的重要關鍵性談話或政策的制訂，都相互謹守一個中國政

¹⁵⁷ Parris Chang, "Beijing'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 Elite Conflict Model", in Tun-Jen Cheng, Chi Huang & Samuel S. G. Wu, eds.,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p. 70.

¹⁵⁸ 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台北：五南，1998），頁5。

¹⁵⁹ Huang, Kim & Wu,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1951- 78", p. 45.

策獲得證明：

表 2~2 兩岸領導人對兩岸問題重要談話（1979~1987）

人/事	時間	主要內容
中共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	1954/ 8/22	中共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發表「解放臺灣聯合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
中共外長周恩來	1954/ 12/8	針對中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發表聲明，指稱該條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侵略性的戰爭條約。
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1958/ 2/10	在中共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講：「美國在中美會談中堅持要中國承認它霸佔臺灣的現狀，是同它企圖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分不開的」。
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1964/ 12/21	在中共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時，強烈譴責美國長期霸佔臺灣，力圖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製造「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臺灣」的陰謀。
中共外交部	1971/ 8/20	針對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喬治·布什向聯合國正式要求把「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的議題列入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會議議程發表聲明。聲明中指出：「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類似的荒唐主張，堅決反對『臺灣未定位』的謬論，堅決反對『臺灣獨立』的陰謀。」
中共新華社	1971/ 10/22	發表「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評論文章。
中美雙方政府	1972/ 2/27	中共與美國發表「上海公報」。
中美雙方政府	1978/ 12/16	中共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葉劍英	1979/ 1/1	1.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三通四流。 2.停止砲擊金門。
鄧小平	1979/ 1/14	台灣可維持原有社經制度，與其他國家維持「人民對人民」的經貿關係，維持原來軍隊，但台灣須將主權交給北平，取下中華民國國旗。 假若蘇聯介入台灣，或者台灣不願談判，中共將使用武力。

鄧小平	1979/ 1/30	中共不再使用「解放台灣」一詞。 統一問題乃中國內政問題，短期內不會對台灣使用武力。
蔣經國	1979/ 4/4	蔣經國總統提出「三不」政策。
鄧小平	1979/ 10	台灣可保有軍隊和廣泛的自治，但得改變中華民國的稱呼，成爲地方政府。
中國國民黨十二大	1981/ 4/1	通過「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
中共人大委員長葉劍英	1981/ 9/30	發表「進一步闡明關於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即一般通稱的「葉九條」。強調「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 國共兩黨舉行談判，重申三通四流，台灣作爲特別行政區。
孫運璿	1982/ 6/10	中共所謂「和談」，實際就是企圖併吞台灣的中華民國。 中共應儘速放棄「四個堅持」，只要大陸上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差距縮小，中國和平統一的條件就自然漸趨成熟。
廖承志	1982/ 7/24	「致蔣經國先生信」-----國、共兩黨舉行談判以達統一。
中美雙方政府	1982/ 8/17	中共與美國發表「八一七公報」。
中共五屆五次人大	1982/ 12/24	中共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設立特別行政區」
鄧小平	1983/ 6/26	給台灣以司法、外事、對外經濟活動和軍隊戰力，統一後台灣使用特別旗幟，台灣使用「中國台灣」的稱呼，此即通稱的「鄧六條」。
孫運璿	1983/ 9	指「鄧六條」係妄圖將中華民國地方化的陰謀。
鄧小平	1984/ 2/22	首次提出「一國兩制」。
朱撫松	1984/ 2/28	指一個國家裡面容許許多種不同體制的說法，實際上行不通。
蔣經國	1984/ 10	中共所謂「一國兩制」是蠱惑自由世界。
鄧小平	1985/ 9/15	不承諾不使用武力，因承擔了這一義務，和平談判就不可能。
	1987/ 8/14	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將開放探親。

中國國民黨	1988/7/7	「十三全」通過「中國國民黨現階段大陸政策」案。
-------	----------	-------------------------

資料來源：宋國誠，「忙與盲，軌與詭——論兩岸互動關係中的認知和警覺」，趙春山編著，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台北：民主基金會，1991），頁 131～133。及行政院陸委會 <http://www.mac.gov.tw/index1.htm> 網站。

兩蔣時代避逃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兩蔣威權政治領導下，幾乎全體台灣人民都認同當時兩岸分裂狀態，是因中國內戰延續的結果的說法，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前，縱使有少數持異議者，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亦難撼動國民黨既定的「一個中國」國家認同政策已如前述。

就台灣而言，兩蔣時代爲了強化中國的法統地位，在意識型態方面必須堅持三民主義的優勢理念，在制度方面，爲了維繫即有傳統，憲法保持長期不修，僅以臨時條款的變通方式，處理因時空的差異所導致憲法在制度上和功能上的不協調，寧因保護「法統」而承受「萬年國會」之譏。外交上，中華民國刻意迴避一切不利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行爲，拒絕任何足以引起台獨、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混淆行徑，如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時，不願接受美國有關「雙重代表權」的安排，即便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外交日益困境之際，仍不接受馬利、蘇立南、利比亞等國同時與兩岸建立外交關係的提議；爲了確定中華民國的正統地位，台灣必須全面否定中國大陸，力行「漢賊不兩立」與「三不」政策；而當時中華民國所推動「一個中國」政策具有排他性，是強行將中共與中國分割，另外，台灣也自歷史、文化方面，強調兩岸血脈相連與相互一家的概念。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孫中山所承傳，經蔣中正發揚道統，及台灣唐山淵源等等，¹⁶⁰強調台灣與大陸文化及族群的同一性及政治制度的差異性，意圖利用文化及族群的同一基礎，結合兩岸人民力量來推翻「非法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企圖極爲明顯。

¹⁶⁰ 趙建民，兩岸互動與外交競逐（台北：永業，1994），頁 6～7。

就大陸方面而言，在一九七一年以前，沒有具體的對台政策，也沒有對台的常設機構，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才逐漸改變；在一九七六年以前中共對於其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排名如下：¹⁶¹

- 一、蘇聯壓力。
- 二、經濟發展與現代化。
- 三、台灣問題的處理與中（共）美關係正常化。
- 四、日本的合作。
- 五、內部安定、團結與權力之重整。
- 六、對第二及第三世界的關係。
- 七、台灣的「解放」。

顯然中共在一九七六年以前，不僅對於解決台灣問題的作為不詳盡，甚至對於台灣問題的解決也不急迫。

但是中共由對台灣無具體作為，逐漸變成具體與靈活多樣卻是不爭的事實，依據陳慶的分類，計有：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的呼籲和談和軍售問題，其中包含有：「台灣關係法簽訂」、「八一七公報簽訂」、「對台呼籲和談」及對台灣領導人動之以情，如廖承志向蔣經國寫公開信、葉九條的發佈、利用台獨勢力等等。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第二期的開始重視台籍人士要求期，其中包含有：一連串的台人學術研討會聽取台人對兩岸問題意見、表現對台人利益的重視、加強對海外僑界的統戰、一國兩制的提出等等。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〇年第三期的對台灣民主化的衝擊及對台灣大陸政策之回應，其中包含有：運用台籍人士、開始紀念孫中山先生及肯定國府抗日戰爭貢獻、召開第三次全國統戰會議，統合統戰力量及反應台灣的大陸政策等¹⁶²。顯然中共對於台灣的政策也隨著台灣內部的變化而不斷的改變。

¹⁶¹ 陳慶，中共對政策之研究（台北：五南，1990年12月初版），頁20、31。

¹⁶² 請參閱：陳慶，中共對政策之研究一書有關中共對台政策的分類與內容描述。

在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敗走台灣，到蔣經國晚期之間的兩岸關係，可以充分顯示在一個中國政策及國民黨對共產黨鬥爭下的兩岸關係本質，這個階段，兩岸雖然都以一個中國做為對岸政策的主軸，但「一個中國」必須是中國國民黨統治的中國或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絕不容許妥協，也絕無大陸與台灣分裂成兩個國家的意圖，而兩岸的兩個政黨，卻又因國際局勢與國內局勢的牽制，實在無足夠的軍事力量讓對方就範，而造成平衡穩定的對峙關係，也開始了雙方制度的競爭關係。

就台灣而言，因經濟的發展，牽動民主化與自由化的發展，終於在台灣內部造成對國民黨一黨獨大下設定的一個中國國家認同進行反思，並在族群認同、制度認同與文化認同上悄悄的進行著質變，雖然中共對台「兼併」的主軸未變，但因台灣一方轉變，使兩岸關係呈現了與兩黨敵對的「平衡穩定的對峙」關係完全不同的面貌。

有論者認為，獨裁國家或其他非民主國家向民主國家的演進規律，約有如下的理由：¹⁶³

- 一、演變的根本原因在於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
- 二、演進的突破是打破鎖國，進行開放政策。
- 三、演進的推力雖有領袖的主張，但民眾的推動不可磨滅。
- 四、世界環境的影響極大。

台灣在蔣氏父子主政期間，隨著台灣經濟的繁榮，對外開放旅遊、對大陸探親，外交政策接連失利及國內民主化的要求，而明顯的由蔣介石的極權向蔣經國後期的開明專制前進，也造成國家認同再也無法由主政者依據極權統治方式形塑，兩岸關係也悄悄進行著改變。

顯然兩岸關係經歷「漢賊不兩立」、「三不政策」的水火不容狀態，或呼籲黨對黨談判（一九八二年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是代表），但隨著台灣的政治變遷，卻將台灣推向各種政治勢力並起的狀態，已非國民

¹⁶³ 孫哲，獨裁政治學，頁 234~244。

黨一黨可以完全掌握的環境，所以到李登輝時代，台灣領導階層就直接否決了兩黨談判的提議，這種轉變充分的顯示了如下幾個特點：

一、中共仍一貫的以統一中國作為對台的政策，在兩蔣時代國民黨亦以一個中國作為對大陸政策的基調，當時國民黨與中共一般停留在黨、國不分的境地，所以兩岸的關係只要國共兩黨對談就可以解決。

二、台灣在經歷民主化的衝擊之後，各種政治勢力並起，國民黨僅是台灣諸多政黨中較具實力的政黨而已，反國民黨的最大力量，又以台獨為尋求選票的訴求，所以台灣對大陸政策的「共識」已漸難整合。

三、對於台灣認同問題逐漸左右政黨特性，兩岸關係也深受衝擊。

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逝世為止，整個兩蔣時代，兩蔣均是以強人的姿態領導台灣，對於傳統中國國家認同毫無妥協的餘地，台灣民眾在主政者教育下，對於傳統一個中國的認同也奉行不踰，這種奉行與支持，反過來加強了台灣領導人（兩蔣）對中共鬥爭的態度，而兩蔣對於大陸鬥爭的理論基礎，初期大體是依據「內戰理論」進行，直到蔣經國晚期財物時的轉為以「同一性理論」中的「國家核心理論」進行，但不論是「內戰理論」或「國家核心理論」，都是以中華民國為正統、為中心，並企圖「光復大陸」、「消滅共匪」，因此，不管理論的運用如何改變，兩蔣時代所秉持的，仍是以「一個中國」國家認同為基礎，以面對叛亂團體的心態面對中共。

所以，兩蔣時代以「一個中國」做為國家認同，並依此認同決策兩岸關係的現實，兩岸相互敵視、互不來往成為兩岸關係的基本態勢，因此，總和台灣民主化前的兩岸的關係變化，以最簡約的方式描述就成了：

一、漢賊之爭：是中國人同蘇俄代理人的漢賊之爭，這種爭鬥攸關民族認同的爭鬥。

二、國共兩黨之爭與五權憲法法統同共產黨工、農、兵專制的制度之爭：這種爭鬥攸關兩黨形塑建立的政治制度爭鬥。

三、傳統中國文化興滅之爭：這種爭鬥攸關中國傳統文化與非中國傳統文化兩種的爭鬥。

兩蔣時期（至少在解嚴之前），兩岸基本上都視對方為叛亂團體，不僅要將其平復，更意圖將己方的國家認同內涵（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加諸於對方，因此，雙方無可妥協，必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更重要的是，兩岸關係幾乎可以簡單的以「國內關係」加以形容。這就是兩蔣時期兩岸各自堅持內涵不盡相同的「一個中國」國家認同所展現的特有兩岸關係。

但時序到一九七〇年代中葉後，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挫敗，及國內經濟力量提升，人民開始要求更多的政治主導權之後，台灣國內政治異議勢力急速上升，並以反對國民黨作為動員群眾的基調，先以民主的爭取為手段，在制度上挑戰國民黨政府的專制或一黨獨大政策著手，讓原本一個中國國家認同中的制度認同一環鬆動，接續引發反抗外省族群獨佔政治利益的族群認同及提倡本土化、台灣化後所引發的文化認同轉變，終於在「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及「族群認同」同時發生變化下，「一個中國」認同面臨嚴酷的挑戰，也迫使國家認同往另一個方向轉變，或可說原本在兩蔣時代所形塑的一個中國國家認同，已然不能作為全台民眾唯一的選擇，事實上是台灣國家認同在此變遷中發生了分歧與分裂，兩岸關係也在台灣這種國家認同轉變與影響下，呈現不同的面貌。

